

南开大学右派反动言論选輯

(第 二 集)

南开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研組

1957.10

這裏又選印了我校教師（包括進修教師）、輔助員和學生中的部份右派反動言論，供校內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課程參考。有些右派分子的反動言行，還可以參看我校出版的“學習簡報”。

這份材料仍採取抄錄原話的方法。我們只做了一些必要的選擇、分類。有的加了標題。個別的地方加了一些按註。

材料來源包括：本人交代、檢查、大字報、會議記錄、班、系供給的綜合材料以及報紙等。爲了簡化，一般不再在每段摘錄下註明出處。

南開大學社會主義思想教育教研組

一九五七年十月

水

150

目 录

教 师、輔助員

历史系	章·迺 汉.....63
雷海宗.....1	陳本敬.....66
經濟系	附：閻、章、陳反动小集
傅筑夫.....23	团的兩張大字报...69
陈国庆.....35	丁守謙.....75
林和成.....42	化学系
中文系	方慧麗.....91
朱一玄.....53	沙昆源.....93
張效良.....56	邢肇基.....93
数学系、物理系	生物系
閻树棟.....60	李崇熹.....95

学 生

經濟系	陆慎成.....102
秦福林.....98	陆訓寿.....104
冷寅助.....99	物理系
鍾世賢.....101	張数玄.....106
白俊义.....102	

歷史系教授 雷海宗

(一) 攻擊馬克思列寧主義

社会科学（包括历史科学）有一个根本問題；社会科学是随着资本主义产生而产生，是到资本主义社会，才成为一种严格的真正的科学。

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列宁的帝国主义論，在希特勒上台后就过时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書也过时了。

石器时代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社会，可見生产工具决定意义是大的。

国家不是阶级的产物，而是官僚主义的产物。

农奴，奴隶兩字的拉丁文都一样。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生产工具都一样，因此沒有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分。

人类文化最重要的时代是资本主义时代，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延續。

要根据生产关系来划分历史时期，那原始社会和將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历史該如何划分哪？

所謂五种生产方式只是根据极小范围的材料講的，現在我們知道的事情很少，有的虽然文化很高，但是沒有文字記載，如火星的事情我們还不知道，我們只知道太阳系，还不知道宇宙中其他系，以后如果我們知道了，則現在我們所說的，只是根据极小范围的材料，所以对事情不要輕易下結論。

五种生产方式的提法，馬克思沒說过，是斯大林提的。

土地在各朝各代都是国有。

將來地球上有了人类，是否也有五种生产方式？

社会主义发展規律是循环的，周而复始的。几年几十年要有一次大战，这是規律。

資本主義社會無產階級貧困化問題是不存在的，只是分配多少問題。

在希臘哲學史上無唯心與唯物的鬥爭。

斯大林的民族定義，把語言放在第一位，目的是想消滅猶太。

在資本主義國家，進步學者研究了几十年還搞不通什麼叫資本主義，不知道資本主義是什麼。

五種生產方式是總結出來的，不是歷史發展規律。

“共產黨宣言”是1848年前的作品，對很多問題沒有接觸過，在1895年後馬克思主義是一隻腳走路。

馬克思在哲學上沒有什麼。

馬克思主義不只在1895年停止了發展，而是在1877年（按恩格斯“反杜林論”出版的那一年）就停止了發展。

方法不是容易的，是經過了資本主義社會長期的訓練。立場觀點可以一下子改變。只要學會嚴格的科學方法，就會符合馬克思主義。

哲學家並不自覺的有什麼立場。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根本沒有資格批判羅素，因為羅素是偉大哲學家，大數學家，除非對數學有研究，才有資格批判他。

政治課搞不好，就成了大一公民，我對這個問題考慮了很久。

國家不重視社會科學，國家重視馬列主義，實在馬列主義幾個月就能掌握。

研究歷史很難，歷史學問和政治有矛盾。

“共產黨宣言”頭一段，最後一句，就是從聖經上來的，所以必須知道聖經。

大家都推崇馬克思主義，但推崇的標準是什麼，實在叫人迷惑。

馬克思一句偶然的話，今天大可不必推敲。

現在教哲學、馬列主義基礎、革命史的人，實際上害了他們，以後怎麼辦，一點史料也不知道。

（二）攻擊共產黨

各地有許多半秘密半公開的組織，也有許多割據或想要割據的離心勢力，惟一好似新奇的角色就是共產黨，其實共產黨若剝去外來的一些名詞與口號，不過是一個半秘密半公開的帶有宗教性的以餓民為基礎的割據勢力，他的唯一真正特點就是依附外國，否認國家民族，這也是他始終不能取得其他秘密團體的信賴與合作基本原因。

（“論中國社會的性質”）

共產主義運動是一種宗教運動，在本質上是排斥異己的，在主義上是定于一尊的，共產主義與其說是一種哲學，不如說是一種神道，共產黨與其說是政黨，不如說是個教會……共產主義取得的不是理智上的了解，而是精神上的安慰，正如南北朝、隋唐時代東亞各國佛教徒親印度為‘西天佛國’一樣，今日世界各國共產黨徒以蘇聯為‘北天樂園’過去的列寧，今日的斯大林，在共產黨員心目中不是不普遍的黨魁，而是神秘的教主。……基督教在耶穌死後不久，就已發生派系之爭，兩千年來大小的分裂，無從統計。今日基督教二三百個大小的派別，無不自稱為合乎正道的教會，現在共產教也已開始重演這一套歷史，……。

（1948年8月28日益世報）

除中國外，各國共產黨都有個人崇拜，特別是英美共產黨，黨的組織等於獨立小王國，所以知識分子很少參加黨，參加後受不了也只能退黨。

美共沒有知識分子，要建設社會主義根本不可能，工农知識分子水平太低。

美共已徹底瓦解了，修正主義已經占了統治地位。（匈牙利事件後美共代表大會時說）

英共、美共的參加者都是非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

戰後的英國，與法國所差無幾，它優於法國的有二點：一、它沒有嚴重的共產黨問題，因而無論如何發展，它內部的統一性不致發生動搖；二、它有永遠可靠的美國援助……。

（三）反對黨領導科學、抹殺新中國社會科學的成就，企圖使資產階級社會學復辟。

现在史学界领导都是外行，这问题很大，史学很难发展，不知道党中央是否知道。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不知道，一是知道了没有办法，因为这些人（指现在历史学会工作的领导人员）都是统战对象。

党的领袖忙于当前革命工作，这搞的很好，但科学应由科学家来领导。

社会科学……中国中断……八年，……社会科学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中国未经资本主义阶段，所以社会科学不发达，……。

中国社会科学的十二年规划太庞大，没有办法，搞哲学的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人很少，搞历史的过去有些留学生，但都是学上古中古史的。

十二年科学规划订得主观，不会完成。

十二年科学规划即使完成，也最多改变目前落后状况。中国社会科学的困难不是十几年，而是几十年的问题，……。

中国老的学者已经老了，年青的又学的是教条，所以历史科学就中断了。

中国科学院根本没有成立的必要，而且毫无成就。人民大学没有培养出什么人来。

现在搞社会科学的有三个类型：一是资本主义的方法，这些人很少，从回国后就落后了，接不上去，现在老了后继无人；二是封建主义的方法的人如范文澜；三是现在教条主义的方法的人，这些人都不行。中国没有一个称上学者。

甲骨文的研究，都是胡说八道。

过去几年我们往往下定决心要找奴隶，所以竟有由甲古文中找到满山遍野的奴隶的例证，这也算有志者事竟成吧！

解放后的书，内容贫乏，没有逻辑性，看了使人思想僵化，……。解放前的书，从业务观点看，倒有些好书。

现在的学者都说不出什么来，现在对象“反杜林论”那样的书，研究的人没有了，只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还有人研究，但没有一个人懂得恩格斯这本书，相反，在资本主义国家却有人懂，中国只

有费孝通、吴景超、潘光旦等四个半人懂。

中国学者遗憾的是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训练。

闻一多有多深的造诣，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在清华毕业，清华有美国教授，二是他留过美，学过美国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所以闻一多是中美文化的结晶。

学理工的留学生愿意回来，但学社会科学的人不愿回来，国家希望他们回来是因为我们老了，后继无人，国家怕中断，所以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回来。实在，留学生不用顾虑，回来后学几本马克思主义就可以了。

（四）攻擊黨領導的歷次政治和社會改革運動

思想改造：

中国知识分子过去一个时期一般是一言不发，或是发一套假话，实际也等于一言不发。中国知识分子不发言在世界上占第一位。

苏联对旧知识分子是摧残的，所以科学是落后的，中国好一些，但也有问题，举哲学家的情况看，高级知识分子写东西很困难。

四岁小孩因为当众检讨就不愿与别的小孩接近了。精神虐待（按：实际是继续思想改造），对儿童，对青年来说心灵上的伤痕是不容易去掉，甚至终身不能忘记。

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

实在中国农民的遭遇远不如纳粹统治下的农民苦。

土改时，有些工作做得不好，发动落后，把二流子都提拔上来，后来又要返工。

各国土地一向均为国有，在土地所有制问题上，实际并没有多少文章可作。

无论什么时代农民都是善于消极抵抗的，统治阶级只要叫他感到不满，他就会怠工、破坏、故意减产、除了自己糊口，颗粒无余，所以农民一般是不能奴役的。

工商業改造：

这是两千年来又一次浩劫。

抗美援朝:

以后不应该再说美帝是纸老虎，美帝的生产力是很大的。

反对批判资产阶级思想:

现在中国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实际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思想，只有地主和小资产阶级思想。

胡适是杂家，胡适思想在中国没有影响。胡适没有什么可以批判的，不值得批判。

批判胡适的人都不懂胡适的文章。

现在所有批判胡适的文章，都是形而上学的，现在的书也都是形而上学的。这些教条主义的文章，外国人看到了要笑。

胡适对大陆上的问题看清楚了。胡适写了一篇反驳的文章，没有译成中文，因为人们不了解胡适的原意，而且胡适还击的很有力，无法驳斥。

百家争鸣的方针:

鸣放政策是正确的，但是晚了一些。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这是不成问题的，是否可以不要这样提。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听说这方针在领导人中间也搞不通，意见不一致。

(五) 宣扬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科学

西德比东德生活水平高，英美更高，苏联比英美还是很低的，捷克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最高的，但仍比不上西德，更比不上英美。

美国农民是自由的，没有地主压迫。

欧美由于吃的好胃口小，中国人净吃粗粮胃口很大。

今日的世界，是一个欧美重心的世界，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摆脱欧美的影响与欧美势力而独创自己满意的新世界与新文化。

美国现在没有爆发革命，是因为美国工人生活好。

近代民主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廿世纪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最高阶段，

人们可以随便骂艾森豪威尔。

社会主义是民主集中制，英美是集中民主制。

大家都知道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东西，实在很丰富，二次大战后，美国在学术上属于绝对领导地位。战后最少英美在经济上称霸权。

联合国经济社会委员会所属的教育、科学、文化机构，目前正在着手编辑一套全世界的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发展历史，将来正是此方面最完备的参考书。

那个国家先进就学那国文。在会上我很难说话，说美国科学先进，要学英文，那么别人就不能理解我，所以只得绕个圈子说。

看你很聪明，要学英文才有前途。

官僚主义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不可能想象有官僚主义，在中国、苏联则特别严重；教条主义也是因为落后才产生的，将来资本主义国家建成社会主义时不可能有教条主义。

(六) 反苏言论:

苏联没有一个真正社会科学家，没有一个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例如苏联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许多地方译错了，没有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原意。

苏联没有一本真正学术价值的书，要学世界史，只有学英文，英美有许多好书。

苏联的书在英美学者来讲，不值一驳，所以看都不看。

苏联没有东西可学，特别在社会科学方面，在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大学曾经十七年没有历史系，旧俄的极少数历史学者，又都跑到国外去了，所以我怀疑是中断了，没有什么东西。

米高扬报告（按指苏共二十大会上的报告），把苏联二十多年来全部社会科学都否定了，这看法当然对，的确苏联没有什么。

苏联的社会科学一无成就，自然科学方面只是物理学有成就，其他学科，则只是个别方面先进，生物学特别落后。

苏联的大百科全书，不如资本主义国家的好，没有大英百科全书

料多。

苏联自然科学赶不上美国，社会科学更差了，实在驚人，……。苏联原子能超过英美，主要是因为扩军备战。苏联原子能成就主要是得于德国人的东西。

我真不敢相信苏联农业方面超过美国。

苏联在社会科学问题上做的很不对，革命后把旧的傳統全打断了，只能在馬克思主义教条框子里套。

苏联社会科学比英美落后半世紀。

苏联的历史書没有什么学术价值。

我們学习苏联很困难，因为俄文中保存了拉丁文的困难因素。不是俄罗斯民族就学不好俄文。

因俄文写出来的文章意思識不清。

留俄没什么可学的，学社会科学是否可以到资本主义国家留学，这倒是个新問題。

苏联教条主义最严重，批判教条主义后，只是去掉括弧、引号，把引話改成自己的話，其他仍是一样。

苏联教条主义严重，对旧学者摧殘，大部分的旧学者在国内战争期間或肃反时都跑了，所以社会科学不发达，而批判教条主义后则因为过去学的都是教条主义，所以潜力不大。对以后的期望也不大。

教条主义的产生是由於知識差。

学习苏联先进經驗，实际上不是什么先进經驗，而是承襲帝俄的，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教研組倒是苏联創造的，到現在我还想不通有什么作用。

科斯明斯基有成就，但这人也是帝俄时代培养的，在帝俄时受的基本訓練。

苏联在二次大战后改变宗教政策是因为东歐民主国家对宗教重視，所以苏联也改变，为的是抓住他們。

斯大林象教皇。

斯大林太殘酷了。

列宁在沙俄的学校上了点学，列宁不早死，苏联社会科学不致中斷，斯大林没有什么修养，只是專斷。

目前没有什么科学家，列宁最多算半拉，只是搞的革命理論。

斯大林后期兩本著作，是赶任务写的，片面性很大。

德、意虽垮，而以苏联为中心的东歐各极权国家……人民完全成为国家的工具，毫无个人自由可言，个人人格的价值几乎全部否定。

苏联是代表原始时代的宗教性的大一統主义。这是一种排斥異己的原始宗教作风，自以为善，……其中有极其濃厚的“代天行道”意識，一切的辯理都是工具与藉口，真正的原动力是神秘的信仰与精神的冲动……，苏联的利益高於一切，任何妨害苏联的行为都是“褻瀆神明”之罪，可能时必须彻底的打倒，……。这样以苏联为中心的，富於神秘性的世界主义……是使普世人心惶惶……。

苏联……对中国則始終不肯放松，外蒙完全席捲以去，新疆也在掌握之中，……。自日本投降以来，苏联除在外蒙与新疆势力仍旧且加强其控制力外，并代日本而进入东北与朝鮮北部。

(七) 鼓吹战争，宣揚法西斯主義

和平运动只是一种插曲。有了战争社会才能进步。

战争是列国必不可免的現象，几乎可說是自然的現象……我們甚至可称战争为正常，和平只是旧战争后的休息时期与新战争的准备时期。

战争与人民願不愿意打并不发生关系，即使有关系，也不起决定作用。

国际間兩大壁壘之間的空气总是很緊張的，双方都时时刻刻准备兵戎相見。“武装和平”即是列国和平的絕妙形容。和平是外表，武装是实际，迟早必有一个問題使兩大壁壘火併，……这是自然不过的事……。在历史的透視中，和平运动只是一种插曲，是战后人力疲乏心理疲乏的临时反应。临时的疲乏一过，新战争的酝酿又起，不出几年就又来一次大放血。

在人口过剩的根本問題不能解决之前，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剿不胜剿，撫不胜撫，非到天下割据，各地混战，相砍相杀几十年以至百年不可。

大乱的结果必是人口的大批杀死、饿死与病死。等到人口减到相当的程度之后，减少到财富分配即或不均亦无飢寒危险的时候，天下就又太平了。

(八) 其他

匈牙利这一乱，几万人都跑到美国去了，去的都是匈牙利的精华。

匈牙利事件只能在匈牙利发生，不可能在中国发生，中国人过去生活苦，匈牙利过去生活很好。

如果中国出了匈牙利事件你们参加不？（雷問学生团员，学生說：当然不参加。雷便說：那可就脱离群众了。）

威繼光抵抗倭寇，阻止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中古入信宗教，人死后到天堂，极乐世界，現在人民迷信社会主义，認為到社会主义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只不过宗教是形象化的形而上学，現在概念化的形而上学，所不同的是过去搬出了上帝，現在沒有搬出上帝而已。

現在东欧很多青年人信了基督教，是因为我們用形而上学的批判方法，故不能有力地打击宗教，所以很多人反而信了基督教。

耶稣会是重質，組織健全，消息灵通，梵蒂岡是个人口多到四亿的大帝国，中国應該認識它，并且同它締結深刻的关系。

雷海宗曾指示右派分子譚天榮：你要在自然辯証法上找岔子。

我的立場已經改變了，我在政治上是擁護黨和社會主義的。

到死我也沒有辦法承認是反黨的。

我沒作过官（雷海宗曾任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委員），只是个教授。

我不是反動的，是受右派分子的利用和影響。

現在有些人是有意識反黨的，有些人是沒有意識的反黨。

雷海宗在天津教授們關於“百家爭鳴”的座談會上發言

人民日报編者按：本报編輯部在天津邀請十位教授座談关于进一步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問題，这里发表的就是这次座談的記錄。座談的发言不能像写論文那样严密，但是我們仍然可以从这些发言里看出知識界的一些思想动态和他們迫切关心的一些問題。其中雷海宗先生对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我們在他的发言的后面加注了一些意見，希望引起大家的討論。

社会科学需要不断发展，但是馬克思主义 “还停留在1895年的地方”

資料不够，使許多人不能爭鳴。对百家爭鳴，虽然可能有顧慮，但从天津史学界來說，因有顧慮而不敢爭鳴的还不多，主要是資料太少无法鳴。我們搞世界史的比其他部門材料更少。

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有一个根本問題：社会科学是随资本主义产生而产生的，是到资本主义社会才成为一种严格的真正的科学；馬克思恩格斯是在資產階級社会科学的基础上用新方法和新观点为无产阶级建立了新的社会科学。这里就产生几个問題。一个是中国的社会科学沒有資本主义的阶段，因为中国历史上沒有經歷資本主义，解放前虽向外国学了一点，很少，只是点綴性質，也沒学透彻，在中国人的社会意識里沒有这个东西。即或有少数人比較透彻的接触到資產階級的社会科学，也是从国外留学时接触的，回国后就落后了，接不上去。过去只是为了点綴，今天要求我們繼承过去人类的文化遺產，并在这个基础上来发展新的社会科学，不研究这些就不行。从这一点来看，資料問題就更大了。有些人認為我們只是在解放后才和資本主义的社会科学隔絕，其实过去也并不透彻了解，而今天要求我們比解放前有更多更透彻的了。

解。

另外，对馬克思和恩格斯樹立的新的社会科学的看法，大家在理論上是一致的，承認馬列主义應該发展，可是实际上是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恩格斯死时1895年的地方。1895年以后，列寧斯大林在个别問題上有新的提法，但他們主要談当前革命問題。从了解整理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經驗，建立新的社会科学來說，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馬克斯恩格斯生平也是經常修改他們的学說，他們注意到当时每一个社会科学部門的发展情况，掌握科学研究的材料和成果。可是以后人們就認為他們已解决了一切問題，社会科学不能再发展了。事实上并不如此。1895年以后社会科学上新材料很多，对旧材料有很多新的認識。我們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1895年到今天六十二年的課补上。这不是那一个个人的問題，而是整个社会主义陣营的問題，工作艰巨得很。解放以前对資本主义社会科学已經不是全面掌握，最近新訂了一些資本主义国家的刊物，好多問題就不了解，看不懂。資本主义国家有些社会科学家是反动的，如凱恩斯，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但今天也有許多資本主义社会科学家并不是有意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有的只是一个認識問題，不直接牽涉到立場，只是对材料的分析研究不同。当然，分析到最后，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家都是有立場的。另外历史問題，如希臘史，六十二年来发现了好多材料。1890年在埃及发现的雅典宪法，可以說明好多問題。这本书恩格斯未看到，他如果看到，他在“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書中在有些問題的提法上就会不同。社会科学是需要不断发展的：在理論上大家都这样說，在实践上却認為社会科学是停留在1895年的了。

我和那天挺先生不大写文章主要是材料不够。过去学的好多东西，現在沒有用，今天有用的东西，过去沒有学，需要从头学起。过去我們买了不少資本主义国家的書，但是有用的書沒有买。尤其是研究世界史書太缺乏了。目前我們圖書館要买書，經費又受限制。

对年龄大一点的人來說，他們有他們几十年的习惯，在研究一个問題时，得掌握全面或比較全面的材料才能講話。今天有許多問題是值得

談的，可是不掌握材料就無法談。因此不大量地把过去沒有买来的書买到，进行研究就很困难。我們要体会馬克思恩格斯研究問題的方法，而不是光揣摩他們的結論。馬克思恩格斯是掌握六十二年前的材料做出的結論，如果他們掌握了今天的材料，就会另作結論。如果拿六十二年前馬恩研究希臘史时的結論来解决中国古代史問題，这当然解决不了問題，而只会把問題搞得越来越糊涂。

人民日报編者注：雷先生認為社会科学需要不断发展，而为了发展社会科学，这就需要反对教条主义，这个意見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雷先生認為列寧对于馬克思主义只是“在个别問題上有新的提法”，馬克思主义“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这却是違反了事实。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这是說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論，而不是說关于个别事实的个别論断。列寧正是在社会科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論方面，首先是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專政，关于社会主义建設等基本理論方面，向前发展了馬克思主义。沒有这些发展，沒有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苏联。各国共产党人对于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都有他們的贡献。我們中国共产党人，把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克服了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也使馬克思列寧主义得到了新的发展，因而能够在中国实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而雷先生所說的关于六十二年来古代史的发现，却只是涉及到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个别論断。古代史的研究者当然應該根据新发现的事实，去补充以至修正那些个别論断，但是补充和修正这些个别論断，并不影响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論。这是我們的看法，希望大家討論。

（原載1957年4月21日22日人民日报）

雷海宗給人民日报的信

編輯同志：

讀到21及22兩日你報“天津的教授們关于‘百家爭鳴’的座談”一稿及我的談話后的“編者注”。我对于“注”中的話完全同意，我也是

認為最近六十年来，結合革命运动的发展，馬克思主义是不断地在发展的，我只是願意提出我們过度忽視了最近六十二年以前的人类历史几千年的經驗教訓的进一步研究。我的談話中“1895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問題上有新的提法，但他們主要談当前革命問題，”下半句就是指的象列宁关于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專政一类的理論，上半句“个别問題上有新的提法”即指象列宁对于封建社会所下的更清楚的定义之类。这后者只是“个别的”，而不是“主要的”，他們对于过去的人类經驗沒有時間多去談論，只能在极“个别的問題上”說几句话，他們談的有分量的話“主要地”是有关当前革命的問題，而我們一般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馬克思、恩格斯所樹立的結合过去几千年人类經驗的社会科学部分又不肯体会馬克思思想的精神實質去进一步深入地研究，使社会科学的这一部分一直处在停滯状态之中。

这个意思，在談話中我没有說清楚，除我自己当負責外，我当时的一种想法也有关系。在座談会的半个月以前，我在天津参加了另外一个会，在会上曾发言，与座談会上的发言主旨相同，我在座談会中想避免不必需的說話重复，把自認為不言而喻的話就用半句話帶过去了。在那个会中有发言稿，現把原稿附列于后，作为座談会发言的补充：

我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現在对社会科学工作发表一点意見。

在科学文化事业的大环节中，社会科学恐怕是我們最弱的一环，而这个最弱的一环又极少引人注意，好似它是可有可无，无关重要。据北京方面一个“工作會議分組討論中提出的一些主要問題”这一文件中所載，在“关于科学工作問題”部分有簡單一条如下：

“目前社会科学工作很薄弱，同国家建設特別不相称，應該采取什么有效的步驟来加强它？正确地开展学术批評和討論是党对科学領導的重要方法，在这方面能不能提出几条方針？現在不少社会科学家感到空虛，但不少社会科学家也还有不够虛心和刻苦的情形，党應該采取什么有效的办法来幫助他們？

……”

这一段話很概括，講到人的問題較多，在會議中对社会科学本身的

問題究竟具体地、全面地如何提法，我不知道。对于人的問題我没有什么特別的看法，但我非常同意这段話一开头的总的提法。这个情况的确与我們国家的建設特別不相称，不相称到令人难以想像的程度。談得更具体一点，对于我們在高等学校作社会科学教师的人來說，我們一般地都很难滿足青年学生的要求。他們要求內容充实、面面俱到、有解釋分析、既有骨头又有血肉的思想性强的講演；但我們一般只能粗枝大叶地，有时甚至只能空空洞洞地講演一番，而因为簡單空洞，思想性往往不知从何談起。这是就对內而言；对外，与敌人作斗争，研究批判資本主义国家資產階級学者的社会科学时，我們對他們几乎是一无所知：作战总要知彼知己，我們完全不“知彼”，也就无法談到“知己”，有时對他們乱批判一通，等于赤手空拳地向黑暗中乱打一陣，既打不中敌人，自己也枉費了力气。最后，这也就說明了为什么百家爭鳴的方針政策提出來已滿一年之后，在多数社会科学部門中或是根本没有鳴起来，或是鳴得无精打采。

关于爭鳴而鳴不起来，有人認為是社会科学工作者思想复杂，顧慮太多，不肯爭鳴；这就是說，他們是能鳴的，只是不肯鳴。关于这一点，就我所熟悉的同行的人來說，这种情况虽不能說完全没有，但最少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大家都感到沒有本錢，鳴不出来——不是不願鳴，而是不能鳴。有人常批評年岁較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說，他們解放前文章也写的不少，有时也相互爭論，現在为何一字不写？这个疑問很容易解答。在解放前，为一个字，为一句話，为不相干的一个小題目，可以写出几千字以至上万字的文章，并可展开爭論。这虽不見得都是无謂之爭，但鑽牛角尖的成份的确不少！今日这种文章不能再写，不是不敢写，不是怕人扣帽子，而的确是对这类文章不再感到兴趣。今天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对自己要求甚高，意义不大或談不到甚么意义的文章他們不願再写。所謂有意义的文章，就是在掌握充分材料的条件之下，尽自己力之所及用新观点新方法（当然是新立場）写出来的东西。但問題也就在这里了。观点方法不見得完全有把握，但每个人都願意試一下，問題是在材料。象經濟科学工作者所遇到的保密問題，是大家已知

道的，不必再談。以历史学而論，过去所曾經注意的材料，今日一部分已沒有用处，今日有用处的材料，有相当大一部分过去沒有注意或注意得太少，一时也来不及全部理出。这还是就中国史來說。講到世界史，問題就更大了：与其他近代社会科学一样，在世界範圍內所要知道的关键性的和比較專門性的东西，大部分在国内很难找到，我們的圖書館，全国所有的圖書館，有关这方面的真正有用的書，实在少的可怜，要凭現有的一点有用的書去作出今天看来有意义的工作，并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在解放前，社会科学賦有濃厚的半殖民地性，主要地是发生点綴作用，沒有踏实的根基；人少，書也少，書絕大部分都是課本和普通參考書一类的書；今后要作工作，大量采購解決問題的書是一个絕對必需的条件。

但問題还不只此。无書当然没有办法，有書也不是全部問題馬上就解决了。我們整个社会主义陣营的社会科学太薄弱，太貧乏，所有的东西几乎都須从头作起，不是短期間所能奏功。在人类历史上，成为科学的社会科学是到資本主义时代才出現的，我們必須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我們新社会所需要的社会科学。資本主义的这些东西不能拿来就用，但是又不能不用，因为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可用的东西。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年前，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場，在資產階級社会科学的基础上，總結了过去几千年人类的历史經驗和科学知識，初步树立了新的社会科学。恩格斯死在1895年，到現在已六十二年，在这六十二年之間，各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积累了很多的革命經驗，丰富了馬克思主义；就中国最近的情形而論，我們党的兩篇論无产阶级專政的文章和毛主席方才提出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報告，都是这方面的突出貢獻。在这一方面，馬克思主义是一直不停地在发展的，新的社会科学是不断地在增加內容的。但社会科学还有另外一面。在这另外一面，在不断深入地、日漸具体地总结人类全部历史进程中的經驗教訓这一方面，这六十年来是几乎完全处在停滯状态之中。馬克思、恩格斯經常掌握当时世界科学、尤其社会科学的一切情况和全部成果。最近六十年来，世界的社会科学仍在不断地有新的發展，不断地增加新的材料，

对旧材料不断地有新的認識和新的解釋。但这些，對我們社会主义陣营的社会科学界來說，是等于不存在的，我們今天仍滿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馬克思或恩格斯在当时的認識条件和資料条件下對問題所說的个别的語句。請我們自己的本行，例如馬克思关于資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的說法，我們基本上仍是一切遵照办理，并且在談中国史时，也尽量去找材料来印証在一百年前的条件下他关于欧洲史所下的論断，无証据处硬要找証据，实在說不通时，就說中国是例外，好象我們的祖宗在創造历史时曾經故意地不遵守历史發展規律似的。我們似乎不願意想，馬克思若在，他今日对于欧洲过去的历史，在今天的条件下，究竟如何看法。我們是如此地不去思考，整个社会主义陣营的社会科学界也是如此地不去思考！无产阶级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当以全部人类文化精华的繼承者自豪，但我們不肯繼承这一份按理属于我們的遺產，反倒把它拱手讓給資產階級学者去利用，而他們时常去濫用。但当他們去濫用时，我們也束手无策，也指不出他們的錯誤，因为我們不掌握材料。

这个极不正常的局面，今天应当糾正，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我們的党提出百家爭鳴的方針政策之后，現在也有条件糾正。如使具体作法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共同商討，但首先必須大家对整个問題取得比較一致的認識，認識到問題的严重性。国家在經費的分配上，在人事的調配上。可以对社会科学多注意一些。我們每一个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同志，必須加倍地努力。努力学习，努力經常地自我改造。如果象會議中所反映出的，有人感到空虛，就要赶快跳出空虛的境界，我們是有廣闊的世界可以活动的；如果有人不够虛心，当知我們还薄弱得很，刻苦鑽研尚恐不能有成，沒有絲毫可以自高自大的理由。毛主席在他的講話中，提出过去一年是偉大轉变的一年，中国社会已有了新的面貌，我們每个人应当有能力、有信心去发展社会科学，适应改变了面貌的中国社会。

雷海宗 1957.4.22

（原載 1957年4.28 人民日報）

雷海宗講述他對世界史的一些問題的看法

人民日报特約新华社專稿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2日在天津市几个学术团体联合举办的爭鳴講论坛上，以“世界史分期和世界上古、中古史的一些問題”为題，向学术界和高等学校的教授、学生发表了講演。

雷海宗教授首先从生产工具的发展說起，他認為从有人类以来，生产工具的发展有四大阶段：第一阶段为石器时代，第二阶段为銅器时代，第三阶段为鉄器时代，第四阶段为机器时代。第一阶段是原始社会，沒有爭論；第四阶段是資本主义社会，后来是社会主义社会，也沒有爭論；問題在于銅器时代和鉄器时代，也就是資本主义出現以前阶级社会这一段。他認為經典作品对这个問題談的很少，唯一較有系統地談过的是馬克思。馬克思根据当时欧洲科学所掌握的材料，在“政治經濟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說来，亞細亞生产方式、古典生产方式、封建生产方式以及現代资产階級生产方式，可以看成为社会經濟形态发展中的几个演进时代。”恩格斯、列宁也在几个地方談到这个問題。他們对亞細亞生产方式一般的不提了。这是因为不仅在一百年前关于这一段知道得太少，就是在五十年前知道得也不清楚。比如現在掌握的埃及、印度上古的材料，絕大部分在一百年前沒有，欧洲学者一百年前对中国上古史則等于完全不知道。而今天掌握的亞細亞生产方式的 材料 比較多。因此，他認為應該根据新的材料重新考虑这个問題。

雷海宗教授指出：按照过去一般习惯，划分社会阶段时往往把銅器时代和鉄器时代的前一段称为奴隶社会，把鉄器时代的后一段划分为封建社会。他認為这样划分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把生产工具基本上相同的时期看成是两个社会阶段，两种不同的生产工具时期看成是一个社会阶段，是違反生产工具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原理的。这样就是只在口头上承認生产工具重要，具体問題上又忽視了它的重要性。至于說生产力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有一定生产經驗和技术并使用生产工具生产物質資料的人，他認為在研究历史时不必过分強調，因为在銅器时代

和鉄器时代，許多經驗、技术，今天没人知道。

雷海宗教授根据他所掌握的材料，对銅器时代和鉄器时代的生产工具、社会面貌进行了分析，說明奴隶制度在世界史上是不存在的。他以銅器时代发展相当高的巴比倫为例：当时巴比倫除了一部分土地由王直接掌握外，另外一部分是私有制，土地租佃制相当普遍，自由身份劳动很多，奴隶劳动反不重要。奴隶、自由人界限不严格，奴隶不但可以和自由人結婚，还可以和貴族結婚。主人对奴隶不能生杀，奴隶多是外来的，本族的債奴劳动三年后仍可回家，这实际上是一种还債的方式。当时保有奴隶的王公、貴族是把奴隶作为他們的家族成員。在羅馬的“家族”二字，拉丁文的原意就是包括奴隶在內的。当时的奴隶大部分是寄生階級，人民中只有少数的奴隶从事生产。因此，如果把这种制度叫奴隶社会，那末，对奴隶社会的定义就需要重新考虑。雷海宗接着談到鉄器时代，奴隶制虽然有了发展，但奴隶在生产中所占地位并不似一般想象的那样重要。不仅在希臘絕大地方是如此，即或是有着近二百年历史的典型奴隶制度的雅典，奴隶在农业生产上也不占重要地位。当时沒有奴隶起义，沒有奴隶与自由民間的斗争，也沒有奴隶与統治者的剧烈斗争。雷海宗教授認為只有羅馬的情况在世界史上是一个例外。羅馬当时經常向外侵略，每次俘虜大量的人，因此，才有了大規模的奴隶制度，这种情况只有海上国家才有可能产生。

雷海宗在分析了希臘、羅馬等国情况后，提出他对銅器时代和鉄器时代社会性質的看法。他說：我們一直尊重馬克思，为什么在这个關鍵問題上忽視馬克思这个論斷？馬克思提的亞細亞生产方式这个名詞可以不用。因为这不是个地点問題，叫亞細亞生产方式也可以，叫其他生产方式也可以，但这是一个时代，是个独立的社会阶段，与后来的古典社会（后来叫奴隶社会）根本不同。“奴隶社会”也就是鉄器时代前一段，我主張仍用馬克思一百年前用的名詞，叫古典社会，不叫奴隶社会。因为高度发展的奴隶制度只在雅典、羅馬很短时期有，他在說明使用奴隶与奴隶社会不能混为一談时举例說：在人类史上第一次大量使用奴隶是羅馬；第二次是西欧国家大量使用非洲人作奴隶，而这已是十六、十

七、十八世紀的事情，如果說這是奴隸制度的殘余，也不能有這麼大的殘余，這也可以說明就全世界的歷史來說，沒有奴隸制度這個社會階段。

（原載1957年6月5日人民日報全文見歷史教學1957年7月號）

雷海宗在中共天津市委統戰部召集的座談會上發言

九三學社天津分社副主任委員雷海宗在發言時先舉出了學校教育中的兩個事情說：我有個老朋友的一個四歲小孩，在幼兒園中犯了錯，被罰站在小朋友中作檢討。這小孩已經養成一種習慣，一回家就關起門來自己玩，不願意和別的小孩接近。我知道這事情以後，我就想，假如十五年後，他到大學念書，做我的學生，他是個怎么樣的學生呢？他如果思想風氣有問題，我是否還忍得給他講呢？還有一個初中畢業生，學習成績很好，但是他不大習慣於熱鬧的場面，別人對他不了解，在保送升高中的時候，許多比他學習成績差的同學都得到了機會，他沒有得到，於是他一氣之下離開了天津，到別的地方上學去了。現在，這個十幾歲的學生，除業務學習外，對其他方面表現得非常消極、灰心。我也想三年以後，他很可能成為我的學生，這樣的學生，我又能給他講什么呢？舊社會中，在教育方面存在的問題很多，今天不談了。而從上面講的這兩個事情來看，他們都是在新社會中成長起來的，為什麼會這樣呢？我想這是我們教育界思想風氣的問題。我們教育人的人，教育人的黨遇到這樣的問題應該首先檢查自己。我對心理學、教育學是外行。但是，我感到解放幾年來，我們進行教育的時候，對兒童、青年的年齡特征注意得太少，不從實際出發，只從籠統的概念來考慮問題，這樣的結果，無論別的方面是怎樣正確，要使兒童、青年成比較完滿、健康、全面發展的人材是困難的。今天，在教育工作中不准有體罰，這是很正確的。但是，沒有了對兒童的肉體上的虐待，卻沒有注意到對兒童精神上的虐待；肉體虐待對孩子們也許幾天就忘記了，但是，精神的虐待對兒童、青年來說，心靈上的傷痕是不容易去掉的，甚至終身不能忘記。我覺得這是因為解放後對心理學、教育學的遺產重視不夠。心理學、教育學發展成為

現代科學，已有八十年的光景，當然其中有許多東西是不正確的，但是也積累了很多知識，不能象目前這樣一筆抹煞。今天，國內心理學家、教育學家不少，但是他們的寶貴知識沒有得到重視。今後黨和政府有關部門應該多注意一點過去積累下來的科學知識，這對改進今後的教育工作是有好處的。

（原載1957年5月22日天津日報）

筆談“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九三學社天津分社副主任委員雷海宗

關於“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問題，說來慚愧，我過去實在是關心不夠，在這個方針提出之後，我長期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只是到最近才開始對這個問題多作觀察，多加思索。直到如今，實際的感受仍然談不出許多，只把我對這個問題总的看法說一說，或者有供黨和非黨雙方今後參考的一點價值。

舊日的統治階級，習慣於發號施令，一般的人民則習慣於唯命是聽，不願聽時則消極抵抗，甚至消極破壞。至於知識分子，在舊社會“高人一等”，他們或者參加統治，那就成了“發號施令”者；或者不參與政治，那他們也有一套處世哲學，就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對政治不滿，則發表“清議”；若“清議”不被容許，他們則可長期地把一切悶在心裡。中國知識分子在不得已時的一言不發的本領，恐怕在全世界的歷史上可以考第一名的。這究竟是一股什麼力量，恕我不能解釋，這只有待中國歷史專家去研究說明了！但這個現象是稍知歷史的人都可體察得到的。講到最近的中国，方才過去的一個時期，知識分子一般地是一言不發的，或者只發希望他們發的一套假言，實際那也等於一言不發。長此以往，這將成為使社會氣氛、使人與人的關係趨於惡化的因素。為了杜漸防微，今後必須竭盡一切的努力來糾正這個令人驚心的局面。今後黨員與非黨員間的關係，必須作到相見以誠，無話不說，說錯話也比不說話要好的地步；可以公開說的就公開說，沒有公開說的條件的就私下說，該說的話必須說出。只有這樣，才能談到有內容、有

意义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以上也就等于说，党与非党间必须交朋友。但请不要误会，我们不是主张发动一个交朋友的运动，不是希望所有有联系的党与非党人士都成为朋友。交朋友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过去传为美谈的刎颈交，普通都是两人，桃园结义也不过三人，一个人一生若有二五个真正的朋友，那个人也就了不起了。交朋友有严格的条件。中国一句老话：“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必须知心，才能作朋友。近年有党员与非党作朋友的吗？——相互间可以毫无拘束地谈话的朋友？可能有；但我们很少听见说过。我们要求不要太高，只求在一定时期内，每位党员能交一个非党的朋友，或恢复入党后丧失的一个早年朋友。仅此而已，仅此已不简单。

过去一个时期，为何会有那种不健康的党与非党关系呢？在非党方面，原因已如上述，不必再讲。在党方面，也有它历史的原因。在过去长期的军事流血斗争中，军事不必说，政治措施往往也必须即决即行，当时没有“坐而论道”的条件。这自然就养成领导革命的党员在一般事务上自断自行或自断而指令他人执行的作法，初解放的几年，解放前所遗留下来的一些必需斗争的工作仍待完成，所以一时仍旧沿袭旧日的作法。在解放后的城市，这当然就更加深了知识分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想法和相关的“守口如瓶”的作风。

实际，过去在老区，党是经常地走群众路线的，但一般地只是走农民群众的路线，对于城市群众，尤其知识分子群众的路线，一般党员是不习惯于走的。用走农民群众路线的方法来走知识分子群众的路线，往往不能收到象农村中所收到的效果，有时甚至适得其反。对于农民，只要满足了他的土地要求，并帮助他在政治上翻了身，其他的道理都很容易讲，他一时想不通的也很容易叫他想通。解放后知识分子也经过了极大的改变，但他的改变与农民的改变根本不同，所从事的工作的性质也不同，思想意识也不同；对知识分子如果象对农民那样地说服教育，他初则惶惑不解，最后则你要他怎样就怎样，实际什么问题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以上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或正在成为过去的过程中。在过去，

这都有它的历史原因，也有它的一定历史的需要。但当初正确的事，继续作下去，可能就成为正确的反面了。毛主席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全体人民真正积极当家作主的课题。这个课题并不是很容易完成的。党与民主党派、政府与人民、领导与群众都必须作一番艰苦的，并且可能是相当长期的思想改造的自我斗争。大家对新局面和新要求都不熟悉，或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抵触情绪，或者怀疑的情绪，是相当普遍的。惯于发号施令的，一旦要他遇事与人商量，固然不是易事；但惯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要他一朝就能积极地关心、积极地参加一切应当关心、应当参加的事，换言之，要他言行一致地成为国家的主人翁，也是好不简单的一件事。必须双方共勉、互勉，才能逐渐地都养成遇事商量、有见必说的毫无心理隔阂的亲密关系。只有如此，人民内部的矛盾才能随时发现，随时解决；只有如此，才算完成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历史任务。

（原载1957年5月23日天津日报）

經濟系教授 傅築夫

（一）攻擊黨的領導

南大經濟系是一团糟，毫无成绩，也不可能有什么成绩，老教授不能发挥潜力，受排斥。南大經濟系太特殊了，有一股强烈的暗流，并不断增长，經濟系完全籠罩在黑暗势力之下。要坚决跳出南大这个火坑。南大是“蛇窟”。我在南大是浮在表层，有随时被整的可能；在人大则沧海一粟，有什么事不会轮到我的头上。

教学改革是领导上要排斥我们；培养青年教师的新生力量，是要把我顶走。

（二）誣蔑、攻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和歷次政治運動以及各項措施

沒有自由的民主就是不民主。我們的選舉制度，只在被選人上圈個圈，是不民主。在選舉票上划圈是形式主義。

引用英國海依克一句話“計劃會造成由豐富到貧困”。（右派分子黃公度曾說：“計劃經濟會產生官僚主義”。）經濟自由，政治民主，才能發展生產。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除了國防鞏固以外，沒有什麼優越性。

“社會主義工業化，中國不能搞，因為太窮了，人口太多了，資金沒法辦。”在土地改革和合作化以後，農民生活很苦。農民苦得比你（對右派分子黃公度）所想像的還要苦。物資供應緊張是計劃不好，是統購統銷搞糟了。

欣賞于家駒以資本主義刺激社會主義的說法，應該恢復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對外援助應該減少，最好關門建設。

我是抱著抗拒態度來對待歷次運動的，對於歷次運動，由於多少觸及到我一點，就引起我的仇視和不滿。

思想改造運動中受到嚴厲的批判，因為反動立場未變，覺得不得了，內心抗拒不滿。覺得思想改造傷了我的自尊心。

鮑覺民在三反中被鬥，是滕維藻利用運動，打擊陷害。

肅反中滕茂桐被鬥，心內有兔死狐悲之感，很害怕。自己的愛人因她弟弟的問題被鬥，所以對運動不滿。

（三）反對、攻擊和誣蔑馬列主義經濟學企圖恢復資產階級經濟學

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只停留在資本論階段，也就是說資本論出版以後，馬列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沒有什麼發展；社會主義部分根本不成東西，因為是在斯大林壓制之下；而資本論本身第一卷和第三卷又存在着很大的矛盾。這樣說來，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就完全沒有什麼價值了。

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一套邏輯嚴密的空架子；對於具體的財經工作，沒有什麼指導意義。

馬列主義經濟學不能指導實際，因為現代的資本主義的實際情況與

馬列時代不同了。雷海宗的馬列主義停滯論有道理，季陶達的文章是從政治經濟學上抄來的。（按當時季陶達同志曾撰文駁斥雷海宗的謬論）

資產階級經濟學了不起，我們要“補課”；資產階級經濟學很有用，馬爾薩斯人口論不正是說明中國的人口問題嗎？

象雷海宗這樣的人才算有學問，才不算教條主義者。黃公度有學問，是搞了幾十年計劃經濟的專家，黃的工資定五級太低，是南大不懂學術水平。

今天的科學研究主要是材料問題，立場、觀點不成問題。

人類歷史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的說法是錯誤的。

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工作者是“教條主義”，“不學無術”。季陶達曾在蘇聯讀過書，但連俄文二、五格都弄不清（按這是黃公度捏造）。季陶達不學無術，不懂科學研究，不但不懂舊的經濟科學，對馬列主義經濟學也同樣不行。他教了多年的政治經濟學，都是根據列昂節夫一本小書，資本論念過沒有都成問題。教經濟學說史是用沈志遠的本子，並不讓學生參考（按落后學生康國雄捏造）。季所以能在經濟系，並不是有能力，是黃老（松齡）走時关照天津市委，說季不要動。

（四）對蘇聯的誣蔑和攻擊

蘇聯的輕工業不如重工業，農業落后。蘇聯的資金積累是剝削農民來的。蘇聯消費品缺乏，蘇聯百貨公司貨架上都是空的。即使有貨，物價高，工人也買不起。

蘇聯社會科學不行，特別是經濟科學落后；蘇聯社會科學不如自然科學；蘇聯經濟學不發展，是斯大林時代個人崇拜，窒息了獨立思考，不可能有創造性的見解。

蘇聯經濟科學落后，內容空洞，邏輯性不强，蘇聯的外國經濟史教學大綱要不得。（1956年在北大討論編寫外國經濟史時，就會說蘇聯的提綱看不出優越性。）

蘇聯派來的專家不都好。專家很多是大學剛畢業；華東師範學院請一位地理專家，許多教授去听，結果大失所望；人大蘇聯專家批判凱恩

斯的文章很不行，沒有击中要害。

苏联社会科学不如中国。1956年听广州中山大学参观团一个姓吴（伍）的人谈：“12年内赶上世界先进社会科学水平，如果是苏联的水平，我們早已赶上了”。傅很欣賞这种說法，并告訴了黃公度。

傅 築 夫 的 發 言

各位代表：

我是南开大学經濟系教授，同时又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經济史教研室教授，我在这两个重要的工作崗位上都犯了严重的錯誤，我身为人民代表，而却是一个右派分子，作了破坏人民的事业，我今天是以至万分沉痛惶恐和惭愧的心情，站在这个庄严的講壇上来向人民請罪，求交代我的严重罪行。

在大鳴大放期間，当各地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我也响应了这个形势，利用党整风机会，藉帮助党整风名义，进行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不过方式稍微与別人不同，就是我不是从正面进攻，不是直接对社会主义制度、理論、政策等等公开加以誣蔑，而是采取了一种更隱蔽的兩面手法，并在发表了一些正面的意見掩盖之下，从攻击一个领导干部——南大副教务长滕維藻同志开始的，另外还对一个非党领导干部經濟系主任季陶达先生进行了惡毒的誣蔑，从而对南大經濟系、經濟研究所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誣蔑了南大整个党的领导工作，給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损失，我的罪行是严重的。

現在因時間关系，我只能把組織上交代过的事实經過簡單交代出来。

由于我对党一直是仇視的，对南大的领导工作一直是心怀不滿的。这种仇視和不滿，并不是仅存之于心，而是經常与我有同样情况的少数几个所謂朋友——黃公度、楊学通、潘源来、有时还有鮑覺民等，拿这些仇恨和不滿当作私下談話的題材，以互相交换这种仇視和不滿，加强这种仇視和不滿，我們把教学改革对资产階級經濟学应有的否定，故意說成是领导上要排斥我們；把培养青年教师的新生力量，故意說成是要把

我頂走；对于捍卫馬列主义經濟学执行教学改革政策的季陶达先生，則加以惡毒的人身攻击和誣蔑，說他是不学无术，不懂科学研究，說他不懂旧的經濟科学，即对馬列主义經濟学也同样不行，說他教了多年政治經濟学都是根据列昂节夫一本小書，資本論念过沒有都成問題。对于他的领导工作就更加对立敌視，由于我們根本是仇視教学改革的，就故意造謠說經濟系是一团糟，毫无成績，也不可能有什么成績，說老教授不能發揮潛力，受排斥，最好都是来把它搞垮，这些攻击和誣蔑，不仅在我們几个人当中經常互相煽动，而且还到北京到处傳播，藉以扩大这种仇恨和不滿，并且还惡毒的認為經濟系之所以糟，是由于滕維藻在幕后操縱，季不过是一个棋子，任他摆弄，于是就把对党的仇視和不滿，形象化和具体化到滕維藻身上。因而在我們几个人中間就流傳了一些莫須有的謠言，說滕在搞宗派，真正排斥我們的就是他！

我們几个人虽然没有什么組織，實質上是一个小集团，事实上还是以我为首。另外几个右派分子——楊敬年、刘君焯、任振威等又是另一团。

当鳴放开始后，我和上述几个右派分子，便認为时机已到，我歪曲党的整风目的，歪曲党的知識分子政策，認为这是党要改变政策，至少在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非交給旧知識分子不可，因为我們是內行，过去的外行领导是失败了，我还无耻的誣蔑說：“馬上得之，不能馬上治之”。科学不是个簡單的事，过去由于否定太多，在学术上造成了严重脫节，現在应该赶快补课了，意思就是說要由我們来补资产階級社会科学的課，整风是改变这些局面的一个机会，我們的陣地是在南大，而南大經濟系和研究所又是一個有名的资产階級經濟学的頑固堡壘，我就幻想經過整风可以改变南大經濟系的局面，其他右派分子都是同样想法，都是躍躍欲試，但是改变經濟系局面那就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达到，必須以集团的力量联合进攻才行，还需要扩大影响，聯絡更多的人，于是便分头进行了一系列的陰謀活动。

首先是楊学通在人民大学和另一个右派分子人大民盟支部领导人之一宋汝紀策划了一个座談会，我在这次座談会中除了以極惡毒的詞句攻

击滕维藻同志，并藉着攻击滕而攻击和诬蔑南大整个党的领导工作，說是一团糟、是黑暗統治、是火坑外，还在会前帮着煽风点火，动员鲍觉民参加。回到学校后，另一些右派分子楊敬年、刘君煌、任振威等还嫌不够，还要再搞一次，我不仅贊成，并且积极策划，除了楊敬年、楊学通、刘君煌、任振威、鲍觉民，各作了多少不等的一些联络、組織、点火等工作外，我在这次座谈会中起了更大的领导作用，我不仅在暗中指挥——因上述諸人不断来和我商量，并且还积极行动，我更主动去动员黄公度、潘源来打消顾虑，要把滕维藻揭发出来。大家在会前安排好发言次序，我第一个发言，我就用上述的恶毒詞句作开场白，实际上是向党进攻的攻击令。我列举了四点所谓事实：一是說滕与别的三个非党员結成所謂“四傑”，証明他有宗派；二是黄公度教課問題，說是排斥老教授；三是成立財經研究室，說他是巧立名目，排除異己；四是鲍觉民在二反运动中被斗，說他是利用运动，打击陷害；下的結論是滕是經濟系的一股暗流。这些“事实”后来知道全都是有人故意捏造的，根本是沒有的。

为什么要从个人攻击开始呢？因为当时 还不敢直接向 党作正面进攻，采取这样隐蔽的办法，把問題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万一有什么不妥，总算是个人問題，可以有退步。至于要把火力集中在滕维藻，那只是选择一个向党进攻的藉口，如果没有滕，也会再选择一个張三或李四来作目标。不过选定滕也不是偶然，因为大家都是 一贯仇視滕的，他过去又是財經方面唯一党员，有能力，业务好，如果要改变經濟系的局面，他是一个障碍，这个障碍必須去掉。

这样搞是企图什么？当时在思想上明确的是要改变經濟系的局面。那么，改变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是要把党的领导干部推倒，由我們这班右派分子来。我們来，是为了要更好地建立馬列主义經濟学么？当然不是！这样，从本質上来分析，显然是要篡夺党的领导权，是为了搞资产阶级經濟学复辟，所以整个的活动，是一种有企图、有步骤、有计划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如果只有这两次座谈会，那就完全变

成偶然，我最初也是企图这样解釋的，但事实上这不过是在鳴放期間，一贯的反党言行的一次較集中的表現罢了。实际上我的反党言行是很多的，是不能在这个短時間內一下子都交代完的，因为我是无一处不与党的方向相对立，而且还是一貫的。一切我都看不慣，我否定了各方面的成績，專門去誇大缺点，我誣蔑苏联社会科学不行，經濟科学落后，誣蔑苏联派来的專家不都好，誣蔑苏联的輕工业不如重工业，消費品缺乏，物价高，农业落后等等，这不仅是有意识地造謠誣蔑，而且是在反对一面倒的国策，破坏中苏团结，在另一方面就是說只有资本主义国家好，苏联什么都不行，这說明我不仅是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場；而且是站在帝国主义立場，是在崇拜压迫了我們一百多年之久的帝国主义者，把旧知識分子最起码的一点民族立場也喪失了。

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我也同样进行了誣蔑，我欣賞英国式的民主，說沒有自由的民主就是不民主，誣蔑我們的选举制度，只在被选入上圈个圈；楊学通說宜兴埠农民苦，我就对黄公度說中国农民苦，說物資供应緊張是計劃不好，是統購統銷搞糟了；听千家駒一次講演，說要以资本主义刺激社会主义，我就十分欣賞，認為自由市場應該恢复，不过我所說的自由市場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場，不是现在形式的自由市場。認為对外援助應該减少，最好关门建設，这說明自外交政策、經濟制度、直到教学改革我都是反对的，我是在反对国际主义精神，反对計劃經濟，（我和黄公度引用英国 海依克一句話：“計劃会造成由丰富到貧乏”，别的倒沒有說過）反对我們的民主制度，其次，我对于历次运动，由于多少触及到我一点，就引起了我的仇視和不满，覺得思想改造伤了我的自尊心，肃反对我的爱人斗错了。总之，我是抱着抗拒态度来对待历次运动的。

除了这些一般的反动言行外，我还利用了人民大學的关系，有意地誣蔑南大党的领导，由于我在人大工作了几年，我就把那边同志們对我的一点客气和礼貌故意誇大，說人大是如何如何尊重我，如何如何信任我，意思就是要襯托出南大是如何如何不好，其实我对人大并不是真正滿意，更不是說它执行党的政策好，馬列主义經濟学搞的好，而是由于我

对南大一貫不滿，就利用这种表面的客气关系，藉以烘托南大不好，我越說人大好，意思就是越說南大不好。

我这些一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惡言行，是有历史和思想根源的。

我的历史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因为我很早就爬到統治階級中去，我是在一九二七年就加入了国民党，作过伪河北省党部秘書，从一九二九年以后，虽一直教書，但也混到了相当高的地位，如在小组会中所交代的，解放前夕，我兼任过最反动的民国日报总主笔，用我的笔和党的革命事业作过战，我又兼了銀行职务，收入丰裕，我就是这样骑在人民头上过着高度的剝削生活，我受的教育又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階級教育，特別影响我的思想的是我交代的那些资产階級学者，我有这样的反动历史，又裝了滿腦子的反动思想，解放后尽管人民寬恕了我，党团结我，重視我，給的我自我改造的机会，但是我不但没有誠意接受改造，反而抗拒改造，滋长仇恨，所以尽管我还处处掩盖，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早已在到处流露了，联系起来就很多，只是不象在这兩次座談会中表現的那样集中罢了。

过去在几次交代中，总是想辯解开脫，怕說出来后果严重，这种顧慮——实际上是抗拒，这样就阻止了我从运动中接受教育，及早回头，結果就更为毁灭的道路上馳进，各位代表的揭发和批判使我受到最深刻的教育，也給我指出了自救的途徑。我开始認識了我的丑惡，認識到我产生的破坏作用，認識到我一切罪行的严重性，当然这点認識还是极其初步极其浮淺的。但是我已經知道我一直是在沿着一条毁灭的道路前进，我一直是在开倒車，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不但已成为全国六亿人民的共同願望，而且已成为全世界广大人民的願望时，我竟站在一个相反的立場上要扭轉历史車輪与人民为敌，妄想搞资产階級經濟学复辟，妄想篡夺党的領導权，妄想以资产階級經濟学来否定馬列主义經濟学，瓦解了馬列主义經濟学，就是瓦解了社会主义的理論基础，这是攻心战术，这与右派分子雷海宗的馬列主义停滯論是異曲同工的，并且我也有类似的說法，說馬列主义經濟学不能指导实际，因为現代的资本主义的实际

情况与馬列时代不同了，这可以看出我的思想是如何反动，然而这并不是一个思想問題，联系到整个一切，就是一个严重的立場問題了，如果再不赶快悔悟，那就只有毁灭了。

我現在不仅痛恨自己，我尤其痛恨我侮辱了人民代表的光荣称号，我辜負了人民交給我的光荣任务，我对不起人民，我也辜負了南大党对我的爱护和尊重，我对不起党，今天人民和党仍在期待我，要把我从毁灭的道路上抢救回来，我不能再辜負了，我保証要繼續深入去挖掘检查，繼續向我的組織上交代，作为低头認罪的一个具体表現。

傅 築 夫 的 發 言

由于今天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座談会，我想利用这个机会，簡單說一下我对南大党群关系的意見，总的說，我对南大党的領導沒有意見，个别來說，我对刘付校长沒有意見，我觉得他是辛辛苦苦要把学校办好的，对前党委書記王金鼎同志，我十分欽佩，我和他有过不断的接触，也向他提过有关改进学校工作若干意見，对系委符書堂同志我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老学生，就连接触不多的王震宇同志，偶尔碰面，他給人以亲切之感，所以就我个人來說，作为一个群众，我与党委領導之間沒有牆也沒有溝，其次关于体制問題，我不贊成取消党委制，党不應該对大学教育放弃社会主义的領導，我更不贊成恢复过去清华式的教授治校制，因为实际上那是把头治校，同样我也不贊成在整风运动之后造成另一偏差，即唯老至尊，把学校变成养老院，問題是应当对老年、中年和青年教师的意見都要信任，都要尊重，因为時間关系，对于这些意見所持的理由不作申述。

現在簡單談一下我对經濟系主要矛盾的看法，由于了解的情况不多，提出的意見可能是很片面，甚至錯誤的，但党在号召我們帮助党整风，整风本是党内的事，所以要号召我們帮助，一方面說明党是大公无私，而更重要的是因为党的事业就是人民的事业，群众的意見即使是錯誤的，也会起“有則改之，无則加勉”的作用，怕錯誤而不提意見，实际上是对党不信任的表現，是对不起党的事业的，因此，即使完全是个

人看法，也应当談出，供党作改进工作时的参考。

南开經濟系和經濟研究所在国际和国内都有一定的学术地位，直到現在还不断有国际友人垂詢研究所的情形，但是这个本已有一定水平的研究所和在國內学术界有一定地位的經濟系，一个是完全死亡，一个是不死不活，这种情况，不仅校內人为之痛心，許多兄弟学校和經濟学界的人也为之惋惜。今天是党要根治这种病狀，要挽救这个損失，我們就不能不找出矛盾的根源所在，不然就无法对症下药，結果不但治不好病，反而使病更加沉重。

經濟系的矛盾，从表面上看来，好象都是季陶达先生負責，因为他是系主任，但他自称是棋子，听说最近他已否認，不过事实上他的作用似乎不超过棋子，系主任是棋子，那么，他的背后必然有下棋的人，下棋的人是谁？最初有些迹象，好象要把一切責任都推到作过系秘書的谷苦堂同志身上，但是有好些步棋，不但布局大，手法巧，而且对于党的威信和事业都有很大的損害的，谷苦堂同志不能也不敢下这样的棋，同样也不是其他系党委同志所能下的。

最近校內和校外有不少同志在分析經濟系的主要矛盾时指出付教务长滕維藻同志，是这些矛盾的根源所在，特别是在北京参加的一次座談会上，有很多同志以具体事实來說明他的种种作风对党的威信造成了严重損害，其中有很多事情我都是第一次听到，我在南大的時間不为不久，平时也深知經濟系有些問題，但却从不去作进一步地追究，而却采取了不正确的高高挂起，采取了躲避的态度，只要事不关己，便躲进書齋不問外事，甚至躲到北京，求“眼不見，心不煩”，而对滕維藻同志的一切所知很少；其次，又因为我一向和滕維藻同志沒有惡感——这不是指見面时客气，而是我认为他很聪明，业务好，在最初筹备恢复研究所时，我还向負責同志推荐他作研究所所长，虽然那时我已听到了一些有关他的作风問題，但是为了工作，我认为他受过严格的科学訓練，懂得如何作科学研究，他是比較合适的人，但是現在党要整风，那就不能不本着“愛朋友也愛真理”，本着党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聞者足戒”的号召，簡單提出下述三点，供党和滕維藻同志本人

作檢查时的参考，并且由于所举的事实有不少都是最近才听到，可能是不詳不尽，其中有涉及到在座諸位，希望及时补充或糾正，更需要声明的是，以下所說虽有些是得之傳聞，但說这些話的人都表示完全負責，都望党去調查。

（一）制造集团：党群間有宗派主义象大家所談的“溝”和“牆”等等，当然是不好的，然而却是自然的，是由許多原因所造成隔膜自然形成的，相信經過整风，也能自然地克服，因为那不是任何人故意造成的，但是滕維藻的集团則是有計劃造成的，他們有核心，有外圍，有追隨者，形成一个規模不小的小集团（实际上是大集团）过去我也听到，但內容不詳，最近在北京一个座談会上听到好几个同志談論“滕氏四杰”的情形，又有所謂“滕維藻路線”并且这是“四杰”之一亲自对一个人講的（希望党去調查）据說他們有划定的一条綫，綫以上的人要打，綫以下的人要拉，不受拉的仍然打（如徐璇），凡是能爬上这条綫的，可以加薪，可以晉級，也可以連升三級，一个接近他的講師，不到兩年便由講師而付教授，而教授，連其本人都感到不安，这究竟是根据什么标准？据說在思想改造时，滕維藻同志把一个历史上有重大污点，解放后又“五毒”俱全的人当作典型，当众宣称，要大家向他学习，我自己沒有参加那一阶段的思想改造，不知是否确有其事，希望党調查一下，那个当作大家学习榜样的典型，究竟是个什么人？向他学习什么？

（二）大规模排斥異己：滕維藻同志过去是財經教授中唯一的一个党员，又是付教务长，主管財經各系，有关經濟系的一切重大决定，他不能推卸責任，事实上許多大棋，我怀疑只有他才能下，而所下的那些棋，又都是以各种方法，在对一些人进行排斥，例如財經研究室的成立就是一个很突出的典型，把十几位教师从經濟系排除出来，究竟动机何在？以研究为名另立機構，难道經濟系不作研究？不能研究？既另立研究機構，何以又不聞不問，从来不作研究？叫財經研究室的先生們去搬書，抄卡片，剪報紙，也未尝不可，不过学校請来教授，就叫他們發揮这样一点作用？而且有几位本来是在教課，却是被停止了授課之后而驅入財經研究室的，这爭奪之間究竟是个什么力量在播弄？夺取黄公度

先生的課是另一典型。黃先生教課受到學生的熱烈歡迎，聽說有一次滕維藻對黃說你教課是譽滿京津，這個突然的夸奖使黃為之惴惴不安，果然不久即由季陶達主任當面質問黃教書好的原因是什么？以後便經過多種布置和安排，停止了黃的授課。過去我一直以為這是絕無僅有的一件怪事，教學好要受懲罰，但最近又聽到類似的事還有很多，而且取而代之的都与滕維藻同志有關，這樣就難把這些事都解釋成偶然了。

（三）利用運動，進行打擊：三反、思想改造等運動都有其重大的歷史意義，黨是要經過批評達到團結，是對群眾的一種教育，絕沒有意思要給任何人以打擊，黨更時時刻刻在嚴防偏差。在運動中群眾不掌握材料，大膽懷疑是可以的，也是應該的，而領導運動和了解情況的人都不可以欺騙群眾，更不可以利用運動作為排斥異己的工具。滕維藻同志為了打垮經濟研究所（有人說最初他要向研究所安置他自己的人，此點希望黨徹查）便利用三反對鮑覺民、楊學通兩同志進行打擊，說他們聯合或知情盜賣十幾萬冊圖書，其實全部所有不過六七萬冊，滕本人是研究所畢業學生，長期與那些書發生關係，知之甚詳，起碼自己讀過，用過的書知之更詳，丟掉沒有，一查而知，然而他不這樣做，並且還欺騙一位先生說，他已經掌握了真憑實據，叫那位先生去勸鮑先生招認，進行這樣欺騙的目的是什麼？管理圖書的鄭鍾堃自殺了，愛人也瘋了，鄭鍾堃到底有沒有罪。他的自殺是畏罪？還是畏別的什麼？這一件事，在北京的一次座談会上有好多同志提出，希望黨調查。

根據我所聽到的一切情況，我覺得這些事實對於黨的威信和事業都有嚴重的損害，特別是身為黨員，而與一些非黨人製造宗派，形成大規模的集團，使“四杰”之名傳遍京津，實為黨紀所不許，希望黨尤其是滕維藻同志本人要深入檢查。

總之，我認為經濟系的主要矛盾，絕不是黨群關係的不正常，而完全是由於一個人的作風問題所造成，正由於這僅是個人作風問題，卻又并不难把造成的損害加以糾正挽救。

經濟系副教授 陳國慶

（一）反對脫離群眾的“自上而下主義”

有人說，全國各個角落都已經透露春的信息，唯獨南開園嚴冬警報尚未解除。我說，春天是擋不住的，“放”是客觀必然性，管他警報解除不解除呢，只要相信黨，愛護我們大家的社會主義事業，就應該主動而又大膽地來“放”。我的顧慮本來也不少，想到這裡，才毅然應“人民南開”之邀，準備大“放”一通。這裡先談談我們學校內部矛盾的一個方面——“自上而下主義”。

誰都承認：民主集中制是民主與集中的有機統一，是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從群眾中來又到群眾中去的絕對不可分割，可是，具體到我們學校生活中，各方面的領導常常生硬地把這有機統一的兩個方面強予割裂，片面地採取自上而下的方法來領導工作，特別是人事安排。這種方法相沿成風，積重難反，日久形成“自上而下主義”。

隨手舉些例子，就先說選舉吧。選舉是民主生活的第一件大事。大學里的許多同志既然被稱為“高級知識分子”，又經過這些年的思想改造，論理無論從文化水平、判別能力等角度來看，恐怕還比較能夠獨立地行使這種民主權利。然而，事實上，我們的領導却不是這樣估計，卻沒有給予我們這種最低限度的信任，以至我們學校中的各種選舉，長時期以來一成不變地一直是由少數人包辦，只有自上而下的集中，極少或者實質上極少自下而上的民主，充分表現了“自上而下主義”的嚴重性。

比方說，第一次區人民代表選舉，當時群眾對聯合提名的候選人是經過領導再三說服才勉強打通思想，事後意見仍然很多。可是第二次呢，領導上並沒有吸取過去的經驗教訓，葫蘆依樣，甚至在做法上比第一次更不能令人滿意。對這次選舉，有代表性的民主人士說，對這次候選人名單我事先並不知道呀；選民說，候選人由你們挑定的，領選票要在我名字畫鉤子，投票要在眾目之下排隊魚貫而行，我就是不同意還能

怎么样呢？又比方說，工会选委員，候选人名單是由上屆委員會酝酿出来的（甚至范围較小的部門委員會的选举基本上也不例外），各小組的代表只有临时就名單投票的份儿。有的代表說这种做法小組同志和代表本人都无法充分表示意見，实在不合理。可是領導上說票都是各个小組的代表投的，选举自然合法。难道說，在我們社会主义国家里，选举只要形式上合法就算了嗎？再比方說，选举先进工作者，第一次根本没有什么选举手續，群众已經輿論大譁，不用去說它了。第二次呢，事先沒有宣傳、沒有酝酿，更說不上評比，只是因为上級有这样任务，定这些名額，就由領導上匆匆拟出几个候选人名單，請群众挑一下，群众說既然是任务，要挑就挑吧，挑那一个都行（自然，也应该指出，群众对这些候选人本身并没有什么成見）。此外，出席校內外各种會議的代表也是这样，一律由上級包办。这种作风并且蔓延到民主党派以及其他社團。

为什么这样做呢？据說为了全面，为了集中，为的代表性。实际呢？为了容易貫徹“領導意图”，为了領導不必更多地开动腦筋。不必費力地进行細緻工作，就可以完成“領導任务”，到是真的。至于对群众、对工作來說，更多的不說，至少下述兩方面作用是确实存在着的。其一，群众認為这些选举早已“內定”自己只有尽投票的义务，即使沒有不滿，至少也不会关心、不会重視。其二，选举出的人不少是凭領導主观想象，沒有在群众中生根；有些也許是有“代表性”，但是有些“代表性”未免太强，也太集中，以至不但代表不了群众，甚至也代表不了自己。

再說人事安排吧，領導不考虑群众意見的情况也很严重。远的不說，举几个最近的例子看。比方說，上次工資改革，在上面压了好几个月，到下面和群众見面，讓群众表示意見，原先決定只給一天的時間，后来有人反对了，才改为头尾不足三天。据說这样急是为了赶快补发，同时，工資調整的方案迟迟不与群众見面，还可以說是保密；可是工資制度不早一些讓群众知道，讓群众討論，以至后来很多人对这新制度还有不少意見，恐怕学校以外的机关很少是这样做的。这就使人怀疑：群

众在我們領導心目中究竟佔多少地位？我們敬愛的領導同志是否还或多或少地、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早被人民群众抛弃的“愚民政策”奉为領導良方呢？要知道，許多同志認為，这次由少数人翻来复去、費尽心机安排出来的工資方案，究竟有多大程度能够促进大多数人的团結，刺激他們工作积极性，值得怀疑；相反地，很多人更怀疑：这里面是否难免存在着不少的“首长主义”（听說第一次提出的方案中凡是系主任一級的一律二級）、“照顧观点”、“亲信主义”、“重点主义”（不少經濟系教師認為自己是沒有被重視，也沒有領導替自己“爭”，听說在会上只有別系的对經濟系提意見，經濟系从沒有給別系的提意見。）

又比方說，学校里几乎全知道，經濟系的季老，身体不好，教学、科学研究、行政、社会活动各方面任务都很重，簡直应付不过来。可是，等到什么新工作来了，領導上对这些客观情况全不照顧，只想到这个工作非季老莫办。譬如最近我們学校恢复經濟研究所，又請他当所长；同时，既沒有減輕他所担任其他方面工作，并且配备的付所长（胡运昌同志）又是市里的大忙人，恐怕不是掛名也差不了多少。

再比方說，目前經濟研究所开始有活动的要籌資改研究室。論理一个科学研究集体放手由一个專家領導就行了。我想这种做法就是苏联也是一样。可是我們呢？这个研究室竟一下設了三个主任。結果呢？据我在极短時間工作中的初步观察，就发现：正主任又是忙人胡运昌同志兼任，自然明显地无暇兼顧；付主任学校一个、工商局一个，又各不能做主。学校方面同志有意見要由学校方面的付主任轉請工商局方面的付主任轉向忙得无暇兼顧的正主任請示办理。目前這兩方面已經产生的对工作看法的不一致，显然已經无法統一。这样的领导情况，要求作好工作，我想恐怕很不容易吧。

例子举的很多了，應該归納一下。我認為：这种“自上而下主义”的一个必然結果便是脱离群众、推不动工作的“少数政治”。这些由領導自上而下地选出或任命的少数人，在領導看去，他們好象万能博士，又象千手千眼佛化身，东也是他、西也是他，里也是他、外也是他，身兼多职，文武崑乱不擋。可是，实际上，群众有意見不用說了；对这些

少数同志，即使他們的能力一般較強，也未免顧了這頭、忘了那頭，那一方面工作也不容易搞好，上面下面壓力對他們都很大，於是只好事事依靠上級佈置，時時向上級要辦法，只有分頭突击趕任務的分兒，沒有主動動腦動想辦法的條件。同時，對這些同志，更使他們苦惱的，六分之五的時間沒有保證，眼看着科學研究計劃一期期完不成，對組織交待不下去，對群眾起不了帶頭作用，對自己更不知從何說起了。

另一方面，我以為，這種“自上而下主義”的最後根源是黨領導方面的宗派主義，因為，在我們目前條件下，分析到最後，學校工作的領導最後還是由學校的黨委決定，或再歸結為黨的領導。我以為：目前，學校里黨的各級領導同志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把眼光只放在很小的圈子裡，放在少數黨員以及所謂“骨幹分子”與“進步分子”身上。他們只相信這些少數人，有事只想到他們，只願意向他們徵求有“代表性”的意見，圈定他們作多種選舉的候選人，派他們出席校內外各種會議，委他們擔任各種工作的領導人，相信只有他們才能執行和貫徹黨的方針政策。可是，這些人，雖然他們除了黨內同志外，多半是在過去各種運動中表現得比較好、比較“進步”、比較積極，同時又比較靠攏黨（從一方面說，這些應該說基本上都是好的）；但是這些人畢竟是少數，並且更成問題的，這些人從舊社會過來，大多數群眾觀點原來就不怎麼強，在“少數政治”的壓力下又更難免脫離群眾，結果原來是群眾自己的黨竟和群眾被不通風的牆所隔開了。

其實，據我初步觀察，最近大家所提到的黨和群眾之間的牆還不止一道。例如舉經濟系的情況說，我最近就有“五層論”的看法。就是說，以系的黨支部為核心（最裡面一層），外面一層是少數和某些黨員往來密切、積極爭取入黨的同志，還包括一部分行政領導；第三層是少數過去在各種運動中表現積極、現在大半擔任某些（還並非全部）民主黨派工作的同志，也包括一部分行政領導；第四層是一般教師同志，第五層是長期被目為“落後”的同志。應該說，這些層的形成，雖然也有其一定的歷史的原因，雖然並不是某些人自覺的主張，但是，主要的，它畢竟是出自人們的主觀的、同時又是僵化的、違反唯物辯證觀點的看

法。而其結果則是：黨的領導就給自己設下層層閉塞耳目聰明的障礙，使黨不能透過這許多層的牆來看清群眾的面貌，聽清群眾的呼聲，而把黨的領導局限在範圍很小的圈子裡，局限在身旁少數難免還是脫離群眾的人的呼吸中。這樣，黨就和群眾疏遠了，上下不通氣了。

今天，我們要反對“自上而下主義”，要拆掉這些危害我們大家的社會主義事業的牆。作為一個民主黨派成員，特別作為一個民主黨派干部，我要帶頭幫助黨來拆掉這些牆。

校領導對經濟系的教師估計過低，從而就沒有積極的組織他們發揮這批人的作用，甚而把部分人看成了包袱。某教授在寫批判胡適的論文時，領導上就叫系助理（黨員）去幫助。我想既然要這位先生去批判胡適，就應該讓他自己去寫，寫出來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大家可以批評。為什麼要找一個人去“幫助”呢，況且這位年青的同志是否看過胡適的著作也是大可懷疑的。讓這樣的人來幫忙，必然是越幫越忙。這說明了黨和領導把我們估計得太低了，把一個學有專長的老教授看的連一個年輕人都不如。這個問題實質上不只是對老教師的不信任，同時，也說明對科學研究缺乏正確的了解。

今年在校務會議上討論教務處擬定的學年論文和畢業論文的辦法中，別的系都有，唯獨把經濟系給拉了，這也不能被看成是偶然的事。由於，各方面的不重視，因此許多教師說，經濟系在全校八個系中是否是第八位也還是可以懷疑的（意思是連個地位也沒有）。

另外財經研究室的成立，分明是在說這批人不需要，但也沒處安插，放在一邊再說。大家為什麼有這個感触呢？財經研究室開第一次會，領導這個研究室的我系副主任陶繼侃同志就遲到了十分鐘，這就反映了領導上對財經研究室的重視程度。當然，其後財經研究室什麼工作也沒有開展起來更證明了大家的推測不是沒有根據的。你想在今天讓一個知識分子長期沒有工作做，這在他該是一件多么苦痛的事。無怪財經研究室有位同志在調離前感嘆地說，不要認為每月給我們照發工資就行了，而要考慮到我們是“人”啊！這是多么痛心的話！

我們經濟系的教師是不是真的不行呢？不是的，許多從我們學校調

到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东北财经学院的教师，都一个个成了那里的骨干，他们工作得都很好。为了发挥经济系教师的作用，因此，我希望党和学校领导应该对我们重新作一下估计。

在谈了有关经济系的情况后，何启拔副教授还批评某些党员和领导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作风上的一些问题，他说，在我校领导干部脱离群众，他们只听取一小部分“积极分子”的汇报，而不深入了解大部人的情况。有些同志在入党前，和教师们还是有来有往有说有笑的，但一入了党就和我们疏远了，他们冷冰冰的，把“党性”表现在脸部表情上和我們交往也似乎生怕沾染了什么似的。我想党吸收他们是希望他们能深入联系群众在群众中起作用，而不是让他们脱离群众的。此外，有些党员同志表现得不虚心，如谷书堂同志给傅筑夫教授一篇论文提了一些意见，但在发表时却毫不谦虚地把自己的名字也挂上了。我看这个做法不一定恰当，这同时还是一个如何对待别人的劳动成果的问题。总之，我希望党和学校领导今后能多多听取、征求和重视，我们教师的意见，来不断改进我们学校的工作。我要求党和学校领导能更多的重视我们的意见，多和我们商量，并不是说要求取消党委制、要求教授治校，而是要求加强党委制，希望党能较多走群众路线，能在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再对重大问题作出决定，从而更好的组织群众发挥教师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来推动我们学校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原载“人民南开”164期）

（二）陈国慶的六條意見書

編者按：这是陈国庆假借民盟支部名义歪曲事实提出的反党綱領。該意見書在他送交曾鼎和同志要他轉交党委时，遭到了曾鼎和同志的拒絕。

中共南大党委：

为了帮助党整风，民盟南大支部于六月一日下午举行了一次扩大的組織生活，分五組座談。在会上盟員和盟所联系的群众对党組織及个别党员提出不少意見。鉴于群众比较普遍地認為目前整风运动已进入第二

个阶段，群众不肯和敢不敢进一步提意見，要看党組織是否能够真正贯彻整风改精神，能够在最短時間內解决若干群众認為可以解决而且應該立刻解决的问题，以具体事实教育群众，增加群众对党的信任。特先将这次会中群众所提出的一部分具体建議，整理反映如下：

（一）平反問題（包括三反、思想改造及肃反中的問題）應該还即研究不同情况用不同形式向群众交代清楚，承認錯誤及缺点，恢复受屈者的名誉（包括已自杀的人）。

（二）人事安排問題，党团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爱人，在人事安排上有特权。无论职位、工资等級均和其才能不相称。这不符合党员吃苦在先享乐在后的品質，而这些問題是非明白，在校内容易处理解决，希望能迅速糾正。

（三）工资等級問題，不少人認為上次評薪定級不公平、不合理。德輕才，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偏高。有人認為工资由少数根本不懂学术的人事干部盲目包办，范恩溥同志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有人認為这次制薪不应做为某些党员自觉地要求減薪降級，而要視作过去評定不当，彻底研究檢查糾正，由行政明令执行。

（四）經濟系和經濟研究所問題。經濟系人多，有基础、有条件，而潜力发挥不出来，是严重浪費。經濟研究所也形同癱瘓。应促請領導重視，彻底研究解决、應該广泛发动群众充分討論，尊重老教师意見。过去对經濟系和財經研究室的人事安排，是根据誰的意見？誰是最后决策的人？應該找出来，明辨是非，追清原因，吸取經驗教訓深入檢查，糾正錯誤，以保証今后工作的改进。

（五）遵守学校制度和紀律問題，很多党员，特别是高級干部，不遵守規章，破坏学校制度。例如生活补助費的特殊照顧，多借工资，私事坐公家汽車，乱請大夫出診。不問工作条件和需要，安插爱人等等不良作风，請党組織公开表示态度，对党员加强教育，并制止以后再犯。

（六）学校制度問題，很多人認為人事处权太大、太神秘，人事制度不健全，严重地造成党群之間的隔膜。学校学术空气不濃厚，官风压倒学风，不應該讓行政领导来领导学术，而應該讓学术上有成就的老教

師領導學術委員會，這些問題希望向上級反映，並研究討論，以謀改善解決。

以上各項意見希望黨組織及時研究考慮。並亦接受下列兩點建議：

1. 對各項意見和建議及時成立若干專題研究小組，並吸收民主黨派、工會和非黨人士參加，共同研究處理辦法；

2. 對各項問題的研究結果及解決措施，應於較短時間內通知民盟組織，以便向盟員及群眾說明交待，協助黨做好宣傳教育工作。

（原載學習簡報第26期）

經濟系教授 林和成

“聽總理報告後感到無限興奮，同時也感到非常慚愧。自己過去曾留學英、美、法、德各國，也到蘇聯去過，花了不少人民血汗，目的為了國計民生，抗戰期間曾作國民黨監察委員，由於舊政治的污濁也未能對人民作出貢獻，二十幾年來主要是教書，翻譯各種外國書籍，大部頭的書寫了十幾本。寫書並非本願，無非找個精神寄托，解放後人民銀行南漢宸到上海找我到總行作專門委員，地位待遇都很高，曾帶領二百多人到天津調查大工廠大商店，作了不少工作，以後因身體不好，到學校教書過着偷懶苟安的生活。總的感覺是：中央的黨，高級的黨對知識分子精誠團結的、大膽放手的。

南開大學的情況是大家互不認識，校長高高在上，黨委書記更見不着面。本來校長就是教授教授就是校長，而今天這種情況只有資本主義國家才會發生。例如在紐約，住在幾十層樓內，大家是不易見面認識的，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等負責人都是高高在上的。可以說南大的團結太差了。為什麼大家互不認識呢？因為大家有顧慮，所以最好的辦法是你不認我，我不認你。留美的學生罪該萬死？會說英文的就是崇美，帽子扣的很多，究竟扣的合不合適就不管了。大家都擔心不知那天算甚麼，只好少認識人為妙了。譬如介紹外國書，在這種情況下，誰還敢介紹英文書籍呢！大家只好客客氣氣刻刻板板，八股最好，沒有毛病，脫離了

各種公式，就說你思想有問題，給你扣上親美、反蘇、反共的帽子！孔夫子以後，不說孔夫子的話就不行！口口聲聲叫學生獨立思考，但是真正教書時，是教給學生蘇聯如何如何，再套上公式、教條主義！同事之間的关系不自然，都是唯唯諾諾，尾巴主義，這種情況經濟系特別厲害，帽子最容易扣，我們不知自然科學中有沒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思想問題，我們經濟學中一切都是學習蘇聯，好像我們中國一點文化都沒有，我們中國在文化上有很多創造發明，好像也得待考，一切都是蘇聯好，這個是蘇聯學者發明的，那個也是蘇聯第一，其他國家都不行，對這種情況我們年老的教授覺得整扭，整個說來，我們中國今天的科學是落後的。但就個人來說，很多是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的。例如在美國的優秀的鋼鐵工程師、造紙工程師、飛機制造工程師不少是中國人。我們有很多知識分子是到過各個國家的。有很廣的見聞，知道的事情也多，如果你不從實際出發，亂批評一通，他們就會感到整扭。

今天沒有一個知識分子那麼傻，還不知道社會主義，還不知道中國以及整個世界都走社會主義的道路。除非他是個瞎子或不講道理的人。我們知識分子，雖然自己慚愧，現在還不夠作黨員的資格，但努力目標是肯定了。而今天有些人一作了黨員就成了“高等華人”，他們說話都是對的。開起會來只有他們幾個人講話，他們認為別人都落後，都是什麼資產階級出身，都得服服貼貼。這不是說中央的黨不好，而是這些黨員太幼稚。我認為無原則的接受任何思想，沒有批判，沒有比較地接受任何事物，並不見得就是真進步，而經過慎重的選擇再作決定，就是落後一些，也比動則取巧的好。

民主黨派的成員里也有問題。有些人看見黨團員就必恭必敬，黨團員那還了得！這說明太幼稚了。我們要尊敬真理，不是黨團員，只要符合真理，我們也應該尊敬。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只是表面上和和平平，客客氣氣，相安無事，但是心里並不服氣。我們南大有宗派問題，有舊南開，有外來的，也有黨團，民主黨派系統的，某人有些关系就提的高。如果說某人學問好，就來個“他的單純業務觀點很嚴重！”如果說某人有著作就來個“他的

资产阶级毒素很厉害！”也没留过学，也没有教过多少书的，就說他道德如何好，实际上年青人既没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也没有吃过什么苦头。道德好在那里呢？至于談到某人是国际权威，他的言行销国外也不在話下。这样的一种宗派就造成一方面是得意洋洋，另一方面是閉門思过，罪孽深重，結果一本书一篇文章也不出来了。这是个很大损失！这不只是南大如此，政治、經濟方面当然不用談，就是統計會計自然科学方面为什么一本书也没有出来，也没有人講演了呢？如果有就是“自我批評”或是批評什么人的资产阶级思想，批評自我批評都是需要的。但是究竟有多少积极的东西拿出来呢？

有宗派，精神上就不舒服，就容易造成消极或是假积极，这对科学是很人損失！向科学进军喊的是很响，但科学是不能突击完成的，不能当时髦，向科学进军，达到国际水平，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现在的国际水平。自然科学我不曉得，統計方面，最新的，我看过48年的著作，48年的书是38年开始写的，总要写十年，現在快要到58年了，我知道的是20年前的先进水平，我們要赶，人家也并不睡觉。要想知道什么是现在的国际水平，我們没有外国杂志，苏联有各国的杂志一万多种，我們就知道批評，究竟錯在哪里呢？实际也不知道。

总之問題是很多的，知識分子还没有死，有生产力。赶上国际水平的中国知識分子，国内国外都有，他們的天才都够，張国藩、楊石先的論文都不錯，就是差了20年。他們有决心，有能力，就是精神差了，問題在于真正放手信任他們，如果实实在在地對他們誠懇地尊重，知識分子有个“士为知己者死”的傳統，他們要的是精神上的安慰，所謂“一簞食，一瓢飲，乐在其中”就是知識分子，士大夫的傳統。长点薪水，吃飯不叫他們排队，出門坐个汽車等等物質上的东西，他們是看不起的，知識分子是不能利用小利小惠来收买的。今天为什么很多在国外的大学科学家願意回到祖国来？他們在外国的物質条件都很好，就是因为他們爱国，他們是知識分子！今天对待知識分子的尊重，还没从联系上，因結上表現出来，还末調整以往對他們的歧視，精神上未解放，未恢复，要解放他們精神上的負担，要真实的解放，真诚的团結，是真的还是假

的，知識分子是看的出来的。

怎样發揮知識分子的生产力呢？要改善生产力的关系。有了机器，工人不願意作工，或是三心二意地作工也不行。改善这种关系要从改善精神上的愉快入手，作到了这一层，才有希望向科学进军。如果只是写几篇自我批評的文章或是批評批評資本主义国家，那不是积极的，对向科学进军没有帮助。我們不能硬搬苏联的东西，苏联是苏联，与我們不相干，或至少目前不相干，苏联在前进我們硬套苏联的公式不行。自然科学的公式是可以反証的， $3+2=5$ ，5也等于 $3+2$ ，社会科学翻过来反証就不行。教書就要結合实际，我們今天是教条主义，脱离实际向科学进军就是既不知道国内实际，也不知道国际实际，我們没有外国書籍外国杂志，俄文是可以突击的，德文英文就不行，圖書館，和我們不相干，有的只是俄文翻譯書，又叫人看不懂。向科学进军不能單枪匹馬，現在向科学进军，既不能參觀、考察，也沒有圖書仪器，大家只有互相抄，变成了“文抄公”抄完为止，抄完了加上帽子，公式就是如此。

当然他們是不承認有宗派的，但是必須打破这种宗派，才有精神上的解放和安慰，我并不是說我們思想不自由，我認为要把思想領域，思想范疇扩大一些。

向科学进军，就要給研究時間，过去通知你开会，你不参加，就給你扣上一个單純业务观点的帽子。

要把党的大門大大的开起来，使知識分子感到他們并不是要不得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困难，开誠布公的团結，毫不顧慮的团結。

过去往往是屈打成招，不管真正有无事实，就用政策威嚇你，說什么“如果坦白，就寬大对待，否則只有死路一条，”高喊“死路一条”……。結果打了一頓，以后証明并无其事，又說“这是你的成績，能够經得起考驗”，真是“妙論”！

（1956年5月28日在南开大学部分盟外教授座談上的发言）

“国家統計局与南开大学的联系不够：（1）統計局与老年一代的

統計學者脫了節，是否否定了老年一代的統計學者。他們幾年來沉默寡言，多半是因為不敢說話。統計局關於統計工作的方針、方案的制定，沒有邀請老年專家參加，我想這裡並無保密問題，應該邀請他們參加。

(2) 統計局的一切都學蘇聯，這是對的。不過科學不應該有國界。只要這個辦法好、科學，就可以不管它是哪國的。(3) 統計局對我們有幫助，但不夠。連報表制度也因為是密件不能充分供給我們。

在學校方面，我們的任務培養建設社會主義的統計人才，要向科學進軍，在 12 年內趕上國際水平。根據這兩點，希望統計局多多幫助學校。學校的統計教材非常簡單，充滿着教條主義與宗派主義，世界上有 140 多國，不能只看蘇聯一國。重重復復的教條主義與宗派主義，不符合中國情況。

任何發展的科學都是以數理為基礎的，但我校未開數理統計課程，因為學生的數學基礎差，不懂外國文，甚至有的連國文程度也發生問題。他們看的是人民大學出版的幾本書。我校的教材九成是人大，人大的教材九成又是莫斯科的。用這種教材向科學進軍，差得太遠了。真所謂坐井觀天，不知天有多高。

統計的教學與科學研究工作需要作很多改良。統計工作、統計教學和統計科學研究三方面的合作，才是這種改良的唯一辦法。解放後，南大經濟研究所停辦，材料分散，有一部分人調到人大，生活指數被認為沒有必要編制了。現在南大經濟研究所雖已恢復，但能否恢復到過去水平，還是個問題。高教部盲目調整，忽視學校傳統，這說明他們做事無遠見，操之過急。

最近我校經濟系與紡織部紡織科學院及天津紡管局合作研究紡織品品質控制問題。試驗合同是一年，每月開會一次。這種做法是很好的，統計局應多多提倡這種合作。有了合同關係，便不會分彼此。

提高教學質量應該採用現代最新穎的統計方法。應該在國家現有老一代統計專家力量的基礎上改進統計方法，應該改變現有一套的關於統計的說法，取消清規戒律；應該鼓勵統計界前輩說話，取消否定老年學者的態度。在學校內，年老的統計學者都沒有教課，教課的都是青年同

志，**現買現賣**，總是差些。

否定其他國家統計方法的做法也應該改變。我並不是提倡英美統計學，但在理論統計方面，英國是了不起的；在應用統計方面，美國很有成就。

總之，要提高教學與研究工作質量，要盡量發揮舊統計學家的積極性，要栽培新的統計學家。

解放前有個統計學會，知道某人在何處，便於相互請教。解放以後，大家星散，情況不明，最好請統計局調查統計一下。統計局是否可考慮建立統計學會，每年開會一次。

在統計學術方面，希望多開座談會、討論會、講演會，希望多請我們參加。

統計科學研究必須具備四個條件：第一是人才；第二是資料；第三是儀器設備；第四是出版。

(1) 目前培養人才有困難，大學生水平比較低。解放後的助教與解放前不同，現在的助教高高在上，認為老教授落後。真正培養，不勝其繁，因為他們外文不懂，數理不通。但不好好培養人才，要進行統計工作也有困難。

(2) 資料的取得很困難，空白報表常常改變。希望統計局的報表制度、內部刊物多多供應給學校。對目前的統計書籍、資料、論文，統計局應做一做調查工作，彙編成目錄。

(3) 目前設備儀器很缺乏，應設法解決。

(4) 出版方面：現在可以說只有統計出版社一家。過去寫書有把握，出書有把握；現在出書無把握，辛辛苦苦八、九年把書寫好，拿到統計出版社，被退回。現在的出版業務應擴大，編輯水平也應提高，把一本書拿給陳達老先生的學生的學生去審查，是不行的。1956 年後世界上統計書籍很多，質量比以前提高不少，很好把這些書影印或翻譯過來。舊版的統計書籍（如鄒依仁、金國寶、薛仲三的書）可以再版，馬上供應社會的需要。老教授的書不敢拿出來。新書出來不要一棍子打死，這樣，他們的著作才能慢慢出來。

总之，教学与研究工作都要统计局多多帮忙，多供应资料，多邀请我们开会，把统计科学研究确实提高到国际水平。

（在国家统计局会议上的发言，转自1957年12期“统计工作”）

× × ×

“民主自由”不能空谈，具体表现为言论、出版……自由。解放后思想上有顾虑，有障碍。现在有思想、言论自由，希望这个真正民主更扩大些。

（1）党团与群众的关系：刚解放在上海，南汉宸很客气接我到北京对党感想很好，有一次南汉宸讲演说党员有“前途”，党员有“前途”很不舒适。南汉宸侄女搞人事骂人，态度使人受不了。有一位同事病去上海，有一人结婚检查了好多次。

（2）马列主义先要调查研究，在“三反”多少人受冤，死了多少人，逼死多少人，多少人成神经病，如对沈默涵的态度，这对知识分子办的过火，这是太粗暴。要彼此相互信任。

（3）尊师的问题：在思想改造时，学生审先生，先生还有脸教学生，死了有小孩、老婆如何办。

（4）本校是否尊敬老师：胡刚复先生有学问，如开物理学会自己去，系主任发脾气。如开些学会，科学讨论会厦大请我去，并未通知我，年老教师无所求，有些事不让我们知道，这如何团结。会计某教授去北京开会，借款条要系助理批，有些人不与系来往怕碰钉子。

（5）如科学研究，不是搞运动，如与纺织医院研究，系不关心。如要买书，买不来便删去，需要助手等……都不关心。

（经济系第三小组讨论毛主席讲话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1957.5.11下午）

× × ×

“我发言代表年老及留学的学生，对近几年的看法。

这个警报很厉害，不是三几天，想我们一般人，一句话不敢说，不知那一天出问题……过去很多书都烧了。外国朋友不来往，新的朋友不能交，这一种警报连无线电不敢开。这是几个大运动而来，内心惧

怕。虽然新社会是好，就觉得不自然、不舒服、这些都是人造的。现在有了自由，感觉舒服些，自由是言论、职业、行动等自由。现在警报虽解除，恐惧仍有，有些无辜受冤如何交代，要看行动。

目前矛盾是党群关系，如在人民银行，精神上不痛快，党员高高在上，党员有前途，非党员是图钱（途前）。瞧不起非党人士，如何在精神上使人发生愉快，有些人有功，应该人位相称，这是分赃制度，这种政治是开玩笑，这样做使老年人灰心。

有些党员品质很坏，如人行一处长乱搞男女关系，影响很坏。处分是轻的，行长的侄女儿二十岁做人事付处长。党员成为特殊阶级。一般人要清高，不愿意被人支配。党员成为一个特殊的阶级，这样使社会内部矛盾永久矛盾。

要消除这矛盾，要消灭统治与被统治阶级。要真正的民主，真正的自由。如在苏联及民主国家可看，听美国电影、美国之音。

如做系主任党员与非党员不一样的。要一律平等。

民主要扩大、自由、平等，否则后果堪忧。开言论之路，老年人不是很简单，目前只说三分，要真正开言路，看事实，要消除过去的影响。

× × ×

（1）有意见不敢向系主任提，系主任耳聩，付系主任笑哈哈有问题要找系助理，自己不愿，有意见不愿谈了，这有些好人。对系主任有隔膜。

（2）节约问题，教师人位的适当问题，把教师要他用非所长的在系、在图书馆内都有，这要好好考虑，要人按其位。如某人可以教英文，在处边找，在图书馆不放。学校是一个整体，系与系、系与图书馆不该有本位主义。内部调整，可以各尽所长。有意见到人事处打官腔。”

（经济系第三组学习内部矛盾问题小组会议上的发言1957年5月18日下午）

× × ×

“几年来，经过几次运动、特别是思想改造运动，使知识分子处在恐怖状态中，任何话都不敢说。因为现在的时代，可以说是是非不辨。今天说是好的，明天就可能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成坏的。比如斯大林，以前是样样好，誰敢反对！后来反起来，就坏了。

目前知识分子的顾虑打消了一些，但还有。因为这不是一句话的问题。你今天说了，过了三个月，就可能挨“整”。所以，要叫大家没顾虑，一定要拿事实来证明，保证真正做到“言者无罪”。比如，在三反、五反、肃反、思想改造运动中，有多少是被冤枉的人！有些投江、自杀死了的人的冤魂还在叫，有些人还在神经病院发疯，对这些人，如何交代、安慰，应有切实的举动，才能广开言路。

二十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自由与民主。在我们国家里，是有民主自由的，但不完全、不完整。比如过去我们总是划个圈子，把思想禁起来，一切发表的言论，尽在圈子里。因为思想不自由，人家不敢思想，结果只有不说话没有毛病。再如开会、布置工作，都是做好了方案，拿下来叫执行，在知识分子看，这也是个民主问题。

当然共产党的功绩是无可否认的。中国在解放后短短几年里，国家能弄得这样好，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在经济建设、人民生活、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提高，是史无前例的；我国的国际地位现在这样高，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大国……。这些不能不佩服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受尽列强欺凌，最大的希望是国家强盛，所以，我们知识分子崇拜毛主席，共产党是不容怀疑的，对社会主义也是没有怀疑的。但建设社会主义，是否完全按苏联的一套方法，却大有问题。这几年，人民生活中有些痛苦没有？财政分配上是否全无问题，建设计划有无问题？应该说，整个是好的，但也是有问题的。这些问题，应多请专家，不管党内党外，来共同研究解决。

几年来，党与非党存在着矛盾，现在一切统于党，非党与党脱离关系，对立起来。“牆”和“溝”是有的，这“牆”和“溝”是在变高变深呢。还是变低变浅？我看还是在日益变高变深。所以，我认为一定要把党和非党关系闹好，不然，如果逐渐发展下去，我担心会发生事

故，象波兰、匈牙利那样不幸的事故，是应当尽量避免的。

党与非党关系上，突出的是“三大主义”：一、宗派主义，实在要不得，有这个，国家的事情就办坏了。要好，在用人上一定要以才、德取人任事，不能以宗派因人设事。所谓“德”，当然不是指扛过几年枪杆子，而是新的道德。现在机关、学校，领导干部都是用党员，用抗战军人或从朝鲜回来的，这是封建制度，不能以国事开玩笑。二、教条主义，讲起来真可笑，盲目地生搬硬套外国人的东西，比如组织疗法、无义、痛生养、睡眠治疗，乱来一气，都闹出笑话，使人对新东西发出厌恶。做学问最恨教条，学问是不问那个国家、那个人的，只问是否真理，是否事实。一定要说什么国家、什么主义好，“一边倒”，是不行的。中国受教条主义的病最厉害，在学校里，一切都从苏联搬、从人民大学搬，不论对的错的，一概不管。三、官僚主义，危害很重，一个年青的党员廿来岁，一切都敢作敢为，但他既没有学问，又没有经验，所以只能靠发号施令，靠官僚主义作风来办事，这怎能不犯错误！

对“三大主义”，深一步研究看看，一般党员、特别是解放后入党的年青党员，他们的思想动机究竟何在？是否入党是为了个人的前途，得到“仕禄”的捷径，特别是个人享受？或是存有出风头的思想？应该检查检查，究竟是何种思想在作祟？依我看，在我们学校里，这种思想是有的。有些人入党以后，待遇高，生活特别优厚，受人找事特别容易……。我看这不是高尚的共产党员应有的品德。

最要紧的是信任人民，相信人民有能力来研究问题，人民所说的话是为国家好的。从信任人民出发，才可以找到自由与民主。比如政协中，让教授站在那里，叫学生来批评、斗争，在学生眼里，我们是落后分子，誰还敢接近呢！”

“所谓苏联专家就是‘小白楼’的白俄”，“不懂别国文字，为什么对苏联专家捧得那么高呢？”“苏联教师是北京卖面包的。”

“听外国的跳舞音乐很舒服，为什么放苏联音乐呢？”

“苏联对各国的援助不是真诚的帮助，如援助波兰，为什么波兰还要去向美国求援呢？苏联的援助是不要你饿死，从各方面来控制”，

“援助中国仅之亿元（意即太少）不是真诚无私的。”“苏联要人家撤退军事基地，为什么苏联要在国外驻军？原子战争时代，无前后之分，无必要驻兵东欧”。“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是苏联人，到波兰去作国防部长，统治波兰，这有伤波兰的自尊心，如果一个外国人担任苏联的国防部长或到我国来当国防部长则如何？”

“（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苏联则是春秋战国时的霸王，其他国家则是附庸，在外交方面跟着苏联跑，苏联发表一篇声明，我们就跟着跑。”

“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由于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才造成国际紧张局势。”

科学不应该有国界，只要这个办法好、科学，就可以不管它是哪国的”，“学校的统计教材非常简单，充满着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世界上有一百四十多国，为什么单学习苏联？重重复复的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不符合中国情况”，“我校的教材九成是人大的，人大的教材九成又是莫斯科的，用这种教材向科学进军，差得太远了，真所谓坐井观天，不知天有多高”，“否定其他国家统计方法的作法也应该改变”，

“在理论统计方面，英国是了不起的，在应用统计方面，美国很有成就。”

“中国民主党派是在野党，民主党派毫无实力，互相监督是句空话。

“在新社会彼此不能说话，不能交朋友，人与人的关系变了。”

“喊毛主席万岁”是不对的，这是封建时期的作法，我们好像在封建社会。”

“不能提意见，人事部门掌握生杀大权。”

“政治课教师都是党团员。”

“解放后不自由，话只能说三分，解放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我又不是二岁小孩，给我一块糖吃，就把话全说出来？”

“思想改造运动是学生整先生，不讲仁义道德，太不近人情，‘三反五反’年轻人审人，不说死路一条，生命财产都掌握在年轻人手中，不知冤屈了多少人。”

中文系講師 朱一玄

寫給南開大學黨組織的信

我曾經以候補黨員的資格在黨內過過幾年組織生活的。後來雖然由於我自己條件不夠，未能轉正，但由於在黨內所受的教育，使我認識到黨是真正為人民辦事的黨，因而縱然我被取消了候補黨員的資格，仍然和黨有着深厚的感情。

正是基於這種深厚的感情，當我看到黨在群眾中的威信降低的時候，我特別要給黨提意見，希望黨及時恢復並且進一步提高黨在群眾中的威信。

是不是黨在群眾中的威信降低了呢？以我個人的看法（也有別人提到）比解放初期，是降低了的。

天津剛解放的時候，我所接觸到的共產黨員，的確稱得起吃苦在先享受在後，在各種工作中都看到共產黨員在帶頭，有一次，全校清潔運動，我和一位黨員同志在一組，他冒着冷風比誰工作得都起勁，以帶動群眾。現在的高教部付部長黃老，當時是天津市委文教部長，到學校里來和教師們座談，穿的是農民們常穿的那種棉鞋，吃自己帶來的土烟，有人把烟拿出來招待他，他都不肯吃。辛毓莊同志不算低級幹部了，生活艱苦到連買紙烟的錢都沒有。但我知道，全國人民也知道，就正是這些艱苦樸素的優秀黨員（當然還有成千上萬的其他黨員）領導全國人民解放了全中國。誰看到這種情況，能不對共產黨員肅然起敬呢？能不覺得共產黨是人民自己的黨，是自己的救星呢？

有這樣的事情，使我們傳為美談；有一位共產黨員銀行幹部，（某同事的親友）在他前一天晚上接到組織交給他的任務，把他調到另一個地方去，一切不管，第二天早晨就很愉快的走了。

所有幹部，全身衣服都很髒，油垢很厚，但我從心里願意和他坐一起，認為他的艱苦樸素，真是值得我佩服！也的確是在那些幹部的帶動

之下，全國出現了儉樸的良好風氣！

親愛的黨，不多說了，總之，那時您在全國人民中的威信真是高呵！

領導權的問題，在我的心目中沒有發生過。不讓這樣的黨來領導，讓誰來領導呢？

從那時起一直到現在，一直到黨決定整風時止，領導全國人民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勝利，而且黨中央和毛主席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仍然很高，這是沒有問題的。今天是在提意見，那些成績不在這裡說了。

可是，為了愛護黨，我必須着重的提出缺點，縱然可能說不對，我也不管了。正象黨經常教導的那樣，“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吧！

我感覺到，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具體地說，黨在我的心目中及我聯系的部分群眾中（不多）的威信，比解放初期是降低了！

為什麼會降低呢？是一些什么現象使群眾對黨不滿了呢？

當然總的說來，是黨中央所指出的“三大主義”的“三害”了。

但具體到南大來說呢？

中心問題，是一個問題。

以學校領導幹部來說：從解放以來，黨的總的作法是在一切部門尽可能的用黨員代替非黨員的領導幹部。舊的人漸漸換下去，新的黨員幹部漸漸換上來。在有些部門由於黨的幹部還沒有那個能力，就派進個黨員作付職或當秘書。雖為付職或秘書，實際上是比非黨幹部的正職大的。

與此同時，跟着來的思想工作是黨能不能領導教學和科學研究問題。得出的結論呢？是黨懂得馬列主義，什麼都能領導。

這些放到領導地位的黨員幹部，是不是在能力上，在資歷上，在威望上都能使大家心服呢？是不是把工作都作的很好呢？往往是黨員布置，群眾跟着走。群眾對黨的幹部不心服，就難發揮積極性，也有人覺得自己話不被重視，有意見說了也白說，干脆不說吧！

無形中，群眾覺得他和共產黨不是“一家人”了。起碼不是知己朋友了！也就是說黨逐漸在脫離群眾了。

我校在配備各單位黨員領導幹部時，是可以稱得起“不問資歷，大力提拔的”。也就是說從資歷上，從年齡上，從專長上，從經驗上，有些幹部在群眾眼中，是覺得提拔的夠快的。我曾舉過羅振濤同志的例子，從工警級提到科長級，沒有特殊的模範事蹟，是難令人心服的。反過去說，郭平凡在解放前是科長級，在三反肅反等運動中，並未聽得說發生問題，在評優中又曾被評為優良工作者，現在卻降到了科員級，這現象除了用宗派主義解釋外，又能怎樣解釋呢？

好！在職位上大力提拔了，分配房子自然要提到和他職位相稱的標準了。到評定工資（調整工資）時，又有二條，職位提高了，工資也要跟着提升，這樣，工資也要跟着提升了。

這些被提升的同志，又大多數在做行政工作，看不出有什麼突出的特長，又未必是優良工作者，他們一級一級的提升了，讓那些比他們資歷老、經驗多，反而在他們下邊的人，怎麼去想呢？很可能，他們的解釋，提升的原因，就是由於入了黨。我看，把入黨和提升職位聯繫起來，是不見得妥當的。

又聽說有些黨員幹部的愛人進學校工作，特別容易，非黨幹部的愛人得到照顧就很難，如果這種說法有根據應該是和“特權”聯繫起來看。

有些黨員不遵守學校的制度，到衛生室看病，不象群眾那樣守制度；有人騎公家自行車到街上辦私人的事。特別劉付校長坐公家汽車到俱樂部跳舞，無論從行政角度，還是從黨的角度，都是很不应该的。現在當領導不同舊社會，舊社會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今天呢？領導就得是在各方面能為群眾表率。作為共產黨員，要求還更要嚴格些。

從南大黨的領導機構說來，從前總支委員會時期。金鼎同志在這裡，總支人數不多，聯繫群眾還比較廣些，現在成立了委員會，書記和部長都不是和廣大教師有聯繫的，因而就更脫離群眾了。

邢公畹同志擔任了工會宣傳主委，他說，有一次黨委會有一位姓曹的同志找他給他下命令，官氣十足，因而使他對黨委會的印象很不好，公开发言，撤回入黨申請書。這裡我不願深責邢公畹同志。我認為黨的

领导同志的作风恐怕有所改进才对。

许多非党同志都提出有职无权的问题，我认为这问题不能从具体负责同志解决，应该从党的领导思想上解决。

还要说一下群众对党员的态度。现在一般情况是，群众有话不敢也不愿向党员讲，当然是怕说错了，挨整。从党的方面却是个严重的问题，因为这是和党的群众路线大相违背的。

事情说的太琐碎了，总结一下吧。

由于以上的原因，群众见了党员往往随便应付，说些不关痛痒的话。表面上说共产党员很好，实际是对许多党员很有意见。这些情况又恰恰是党员彙报不上去的。党与群众有了距离，群众不觉得党员是他最可信赖的知心朋友了，这不就是很大的问题了么？群众再认为党员都有特权，工资高，权力大，本领不强，这不就是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降低了么？

好了，我不要再写了。希望我这些意见，能作为党的参考。也许很不对，但我觉得以我和党的关系来说，我是不能不写的。

（中文系讲师 朱一玄）

中文系进修教师 张效良

（一）**攻撃党的领导：**刘校长不学无术，屁也不懂是靠资历吃饭；中外文系的党员以及党支部书记，也都是不学无术，屁也不懂的人，或者象孙昌、闾美璧，据说就是人格堕落，卑鄙无耻，至于中文系主任李何林先生，也是不学无术的人。

大学里因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官僚主义者不敢横行霸道，农村里更是一团糟，党员是土皇帝，是新社会的恶霸，所以“党的威信在农村里特别降低”，要回到农村帮助进行整风。而且要好好整他们一下，不整不行了，“农村里的党员和国民党军官差不多”，工人也不敢提意见。

党员都以征服者的面孔出现，入党入团后有好待遇，可以享受特权；团里要的是点头哈腰，打开水的人，要的是“奴才”。

党团员是“吹牛，拍马”，阿谀奉承，打开水，倒尿壶的人；是不学无术的人；党证是饭碗，是爱人。

兰州大学校长林迪生，南开大学副校长刘披云，他们都没有资历，没有在资本主义国家留过学，也没有专门的业务知识和科学特长，他们没有当大学校长的资格，应当让具有业务专长的教授来当校长；所有一切没有专业知识的行外都退出学校。

现在的上级党与下级党以及党团员的关系是黑暗的旧社会中的大裙带和小裙带的关系。

群众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而党员团员享福在前，吃苦在后。党和团所培养的是奴才，平行四边形，没有棱角，唯唯诺诺，只会服从的死人 and 机械人。所培养的是吹牛拍马，点头哈腰，阿谀谄媚，奉迎，打开水，倒夜壶的人。党组织是宗派统治，它排斥打击任何一个真正的正直人和最优秀的人，党团员们都是抱着腿子向上爬的谄媚者。党团员伪善，狡猾，阴险毒辣，不学无术，是卫道者，伪君子，皇帝，便衣警察，他们都是利用党员作为手段；而达到自己的可耻目的的骗子。汇报制度是卑鄙，恶劣，背地里陷害人，靠近党团组织的人都是奴颜卑膝，奴性崇拜的可怜相。党团员之间的相处，是一种个人崇拜，互相吹捧，搞宗派。党群关系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由于我是一个优秀正直的人，所以我被长期的打击，排斥在党团组织以外。在生活的任何角落里都充满着宗派统治，到处都是党团组织包办代替，没有真正的民主，就是党团内部也没有真正的民主，那里只有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一些人只是服从，他们都是违背着自己的良心举手说话。

党的群众关系，是新的人事关系，党员总喜欢培养自己的阿谀谄媚奉迎拍马者，因为自己不向党团员奉迎，拍马所以自己也就长期的被排斥打击，不能入团。每个党员都希望有一个人抱着他的腿子向上爬，吃得开。一个人只要点头哈腰用各种方式阿谀奉迎，就可以加入党团组织里去，我是最优秀的人，最有希望的青年，如果象我这样的人不能入团，那么百分之九十九的团员应该开除团籍。团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胡耀邦的报告是教条主义的东西，因为他在自己的报告里没有痛斥自己一贯

所痛恨的閉的宗派統治和宗派打劫。這是束縛青年的思想自由和個性發展的組織。

共產黨員老是以征服者的面孔出現在群眾面前，叫群眾象奴才一樣的服服貼貼的服從他。但自己由於沒有作他們的征服者和服從者，所以就處處受排斥和打劫。共產黨向來以粗風暴雨整人的，而現在又說和風細雨的整風，這是由黨感到問題已經嚴重才這樣提的。我可不能和風細雨；我一定要整倒一些共產黨員。現在高等學校和城市機關還好些，而在農村里問題更嚴重，在那里跟國民黨時的黑暗統治一樣，共產黨員們簡直象是土皇帝，農民是臣子，他們跟國民黨的軍官一樣橫行霸道，農民都是敢怒而不敢言，這一次農民可要起來了，他們要拿起鋤頭包圍鄉政府，他們要造反，我要振臂高呼組織和領導他們反對共產黨。

（二）攻擊馬列主義：中國人民大學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是播送教條主義的根據地，人民大學培養出了許多年青的教條主義者。馬列主義本身就是教條主義的東西，他使人們的腦子僵化，停滯。

人民日報在這次運動中已經顯得落后了，反映問題不尖銳，不大膽，不敢反映一些具有強烈反共色彩的意見，因此讀起來叫人不過癮。人民日報的編輯及編輯部的人們，都是包庇中國共產黨的缺點和共產黨內的三害分子，不敢揭發。光明日報和文匯報反映問題尖銳，大膽，讀起來過癮。

（三）攻擊肅反和思想改造：我對肅反運動本身沒有意見，對執行辦法是不是有問題應該考慮。如果是執行錯了，為什麼在全國範圍內都執行錯了？因為我懷疑這個政策。我認為說怪話的人不一定是反革命，我在班上常說怪話，但我是好人。鬥爭的方法應該徹底破產，對地主鬥爭是可以，對同志鬥爭那是幼稚的。黨內思想水平高的人，掌握政策是好的。

我還承認肅反成績是主要的。我們班鬥了六個，二個就是反革命，事先材料都掌握了。但那三個人還未交代，其中一個是我很好的同學，以後見面也不說話，看起來值得同情的，這不能說成是立場問題。

我們不能把反革命搞出得少，說成是成績小，應該從整個的傾向來

看。肅反的方法不太好，隨便的懷疑是不對的。

我並不否認對反革命進行鬥爭，但是我完全不同意說鬥爭錯了是不可避免的。把所有的鬥爭都說錯也是不對的。

為什麼全國錯誤這樣普遍，我並沒有假設，我聲明我根本沒有‘假設’，我同意的是：為什麼錯誤是這樣普遍。

我非常擁護這個肅反，就是這個方式怎樣把反革命份子提出來，肅反執行政策是怎麼樣？為什麼錯誤的普遍性是這樣大？

我現在仍然懷疑肅反的政策。黨的政策要是正確的，黨員執行就應該是正確的，然而我們看到執行是錯誤的人仍是黨員多，因此，我懷疑政策的下達有錯誤。

肅反在學校里也很糟，蘭州大學就私設公堂，逼供……我班上肅反就是幾個黨團員先準備好，同學們圍一個圈，把有問題的抓過來，大家拼命地吼，有的嗓子喊啞了，有的嚇壞了，有的人被整了，背上永遠的包袱，含羞終身。

我也曾一再強調說，共產黨員、青年團員私設公堂，如雲航事件……。

接紙條在肅反中冤枉和鬥錯了許多好人，使他們的心灵深處蒙受創傷和恥辱，指一輩子，最後一直含羞而進入墳墓。在肅反中對反革命分子呼口號是幼稚可笑神經質，這種鬥爭方式以後應該徹底破產。在肅反過程中共產黨員們私設公堂，幾個共產黨員弄在一起，把一個人拉到背後大家鬥他，逼供他。肅反運動是一片恐怖，是非人道主義的，肅反運動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冷清沒有感情。我看了‘巨大悲劇’。他（指程京）有兩個象對照，非常可怕，我非常生氣，認為對這樣一個天才摧殘是殘酷的思想改造。黨委解釋我不滿意，我90%認為是思想改造搞的。

如果稍微有些人道主義精神的，就應該同情（程京），有些人說他原來是個瘋子，或因為搞戀愛的結果，我不同意，如果思想改造把人搞成這樣，那有什麼成績？希望能把這件事很好地交待。

程京事件是由慘酷，野蠻，粗暴的思想改造所逼成的，……太卑鄙了，太可恥，太氣人了，必須為程京事件合黨鬥爭到底。……這是對人

民的摧殘和天才的扼殺。

思想改造把一些活潑的青年人變成了沒有稜角的死人，使他們未老先衰，思想改造用的是法西斯式的高壓和強制，它摧殘人的個性，使人都成為統一的個性，成為一個模樣的人，限制了個性的發展。

（四）攻擊黨的人事制度和幹部政策： 檔案一定要公開，人事鑑定公開。人事制度是把頭制。現在只有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那些經常抱着黨團員的腿子，給共產黨員打開水，提尿壺的人方能吃得開，現在把人分成四等，最吃得開的是共產黨員，其次是共青團員，再其次是民主黨派人上，最後才是群眾，現在到處都是黨團員的天下，不是黨團員的群眾只能遭到打擊，排擠和報復，並且在任何部門都要插進去一些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就是連宿舍都是這樣的，這是對群眾進行警察式的監視。在工作中只有黨團員才被重視和提拔，群眾根本不被重視。在各個工作崗位上的黨員都是老粗，沒有學問沒有理論的人。以後提拔幹部，應強調業務，政治次之。

（五）攻擊農業合作化和統購統銷政策： 農業合作化的優越性不大，把農民限制得太死不自由，因此農民生產熱情不高，生活沒有提高。

統購統銷把農民的余糧全購完了，農民吃的白面少，雜糧多，吃的肉也少，因此，農民對共產黨有不滿情緒。

（六）攻擊人民民主制度： 人民代表不是真正人民選舉出來的，而是上級指定幾個人派到所代表的地方去，然後再叫群眾寫票選舉，表面上是選舉而實際上是委派去的，這不是真正的民主。只有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才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我們要爭取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民主集中制往往片面強調集中，沒有什麼基礎是一種歪曲運用。

國際和國內環境問題，由於有階級鬥爭，專政用得較多，民主沒能好很的發揮。

數學系助教 閻樹棟

（一）攻擊黨的領導

“既然三害是普遍的，長期的，能不能僅僅是幾個黨員或少數幹部的問題。要解決問題（指三害）要從上而下，從下而上，來個全民性的檢查、整風。大字報上強調下邊有問題，上邊正確，我認為不只下邊幹部有問題，黨中央也有問題。”

“蘇聯有個人崇拜，中國是否也有個人崇拜，在少數民族的許多歌曲中，歌唱毛主席給我們帶來了什麼什麼，派來了什麼什麼，這是否有些過分？”

“日本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也不開會，而科學倒發展得非常快；美國經濟、科學、文化的水平很高，雖然資本主義制度不好，但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

“科學受馬列主義的約束，因此不能發展，黨要象導師一樣的指出路綫來，才能領導科學，否則不能。”

“有些學術上有成就的知識分子變成了‘木頭人，擴音器’，擔任一些有職無權的行政領導職務；單憑老的鬥爭經驗是不夠的。”

“黨的領導我不反對，如果領導不好，就要下台。”

“儲安平的黨天下問題，不是絕對的，要看普遍的。以南大為例，領導普遍的用黨員，但才能是否適合工作性質。”

“復旦大學黨委已退出學校，南開大學也可以考慮。”

“把共產黨整垮了怎麼辦？由誰來領導？我考慮了很久，右派分子改組黨的說法在我思想中也有這想法，認為比較成熟的辦法是各民主黨派聯合參政，聯合領導，否則中國就很危險。”

“現在衡量人的標準第一條是：是否是黨團員，有些人學得好，而非黨團員，就被視為單純技術觀點，加以鄙視，這一風氣在教師中也存在，同學對非團員教師有些疏遠，不用功學習吧，來回動的人倒可以得到信任。”

“中共應該再虛心些，過去作事是聊以自慰，應該從群眾來衡量，作事要多徵求同志的意見，提反面意見並不一定就是違反，過去對這些事我都表示沉默。”

“解放後，黨團員把我變成了一瓶酒，一口袋花生米的狀態，青年

人过去太老实，提反面意見太多，对不合理的現象，应当敢說敢罵。”

“落后的人并不是木头人，有独立思考能力；報紙上所表揚的人，都是順着党說話的人。”

“程京情况你們不了解，我住在东楼，我了解情况，不象党說的經常有人照顧，我从来沒有看見有人照顧。”

“我的命运为几个人掌握，在工資問題上我是不合理中的不理。”

“党支部喜欢拍馬的人。”

“踢球的小伙子們都恨党员，常把球当作党员，先大罵一声，然后才狠狠一脚踢出去。”

（二）攻擊馬列主義

“事物是发展的，昨天对的，今天不一定对，今天对的明天不一定对，过去認為对的，今天都錯了，对馬列主义我以前沒有研究，二十大以后对于馬列主义是否正确发生怀疑，过去斯大林的言論是公式定义，現在分文不值，真正的真理不能轉180°的大彎，斯大林个人影响經濟学发展，一个人左右整个科学部門。当时思想混乱，怀疑斯大林是否創造性的发展，馬克思主义，对斯大林功过的估計是阿Q精神，甚至連他自己是什么人都不知道了。”

“討論問題不应有立場，否則是非分不清楚；談問題要講立場，就象一个人要自己揪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一样。真理愈辯愈明，不應該受立場的限制，真理应当有一个沒有立場的客观标准，如古代的斯巴达，雅典的哲学家爭論非常激烈，也能解決問題，但是他們没有什么階級立場。強調立場就与鳴放有矛盾，这样輕則約束独立思考，重則違背事实。”

“政治輔導員作用不大，是否仍有設立的必要？大学里的政治課可以不要了，請一些有鍛煉的人来作报告可能好些。”

（三）攻擊肅反政策和思想改造

“思想改造的方式是粗暴的；对鎮反是否錯杀了人表示怀疑；肅反是先假定斗争对象是反革命，然后加以証明。”

（四）攻擊人民民主制度

“民主、自由是天賦的本性，一个人只要不損人利己，完成工作任务，任性些是好的，想干嘛，就干嘛？应当給青年一定的自由度；現在有机器人的风气，同學們文化生活內容不如解放前丰富，解放后剛提个性发展馬上收回去了，各种清規戒律，馬列主义政治課是教条，限制了个性发展，独立思考，使青年人逐漸变成木偶，現在要發揮各人的特长、积极性是不可能的。”

“学生的班干部及人民代表的选举不民主，同意大字报提出的改选人民代表的意見。”

“青年思想应解放，怎么样解放呢？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扩大民主、自由！所謂自上而下，是上面支持給三害有力的打击，自下而上是：意見可以越級提，过去虽然可以这样做，但是不够。”

“匈牙利青年是有血气的。”

“我以前生活有二个目的？一为社会主义服务，一为桃李滿天下，現在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沒有了，因为有几件使我非常寒心的事。”

數學系助教 章迺漢

（一）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攻擊

“三害存在是否与制度有关？如果只是一党專政，是否錯誤必然要产生，改进也不解決根本問題，可以从制度考虑。”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否有缺陷？过去并不意味着人民当家做主，并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整风运动也不解決根本問題。”

“思想有信仰自由，彙报制度是侵犯人权，彙报过程就是侵犯。有什么权利干涉別人！應該彻底取消这种特务手法，它違反宪法的規定。”

彙報制度是特務手法，是侵犯人權，違反憲法，與國民黨相類似，有些人拿彙報別人的缺點加以誇大，做為自己晉升的資本。”

提出問題：除了工人階級思想外，其它思想是否均在批判之列？既然有信仰自由，為什麼一定要學政治課？”

“匈牙利青年是好樣的、勇敢的。匈牙利解決問題很痛快，中國若無此次運動也會有匈牙利事件，如果我在匈牙利也保證不了不拿起槍桿。”

“現在的社会黑暗，民主受到压制，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也把人变成鬼。”

（二）對黨的領導的譴責

“在‘西望長安’中，栗晚成一直爬的很高，這說明現在用人并不是‘真材實學’，看牌子，黨員、英雄，個人崇拜勢力非常之大。”

“黨拚命要人提意見，結果是石沉大海，把提意見當做‘擋箭牌’。”

“分配留學生有99%的是黨員，群眾中就沒有夠得上條件的嗎？裙帶關係現在還可以看到。”

“黨正象漫畫所揭露的那樣‘用雞毛撿的雞毛一頭輕輕的刷自己，而另一頭（竹棒）狠狠的打擊別人。”

“黨委書記、市長沒有必要參加體力勞動，這根本是夢條，這根本不可能與工农結合，只是作表面上的事情，對思想簡單的人可以馬馬虎虎的騙過去。”

“我認為黨是一個為自己利益的自私集團。”

“他們（指黨）會發明名詞‘大民主’‘小民主’，我也可以發明一個‘大裙帶’、‘小裙帶’，你們來學吧！我在思想上就認為內部矛盾主要產生於共產黨腐化，脫離了人民。”

“共產黨要完了，越要完越殘暴。”

“黨在科學文化上的成績不大，系里工作強調政治條件，學術空氣不濃，同意黨委退出學校，外行不能領導內行，不學無術的人退出學

校。”

“小日本的科学家不开会，人家科学发展得很快，党給予科學文化上的一個很大的限制，幾年來看不出黨領導的科學文化有什麼成績。”

“勞動並沒有被重視，科學院的人所追求的是所長，辛勤學習的人被扣上單純技術觀點，有些不學無術，吹牛拍馬的人，倒很有前途。”

“系主任有頃無權是傀儡，黨支部把持系，我真不了解傀儡活著有什麼意思。背後黑暗勢力在支持閹光耀，系里有拍馬屁的作風，這是胡國定的‘階級感情’所造成的。”

“系內黨員有優越條件，系對助教人格不尊重，助教人格便宜。系內黨支部有宗派主義，對一般群眾照顧少，黨員升級快，工資高。我到老也開不了課，我能開也不行，黨員才能開。

（三）對思想改造、肅反、反右派鬥爭的攻擊

思想改造的方式是粗暴的，不解決根本問題，真正的思想解決不了，僅僅壓了回去，以後不再散布而已，程京問題認為搞的過火了，有些殘忍，都是黨團員搞的。

鎮反中小王庄槍斃了很多，其中不少是搞錯了。

肅反是先假定鬥爭對象是反革命，然後再加以證明。肅反方式不恰當，群眾鬥爭方式太殘酷，給以精神壓力，未免冤枉好人。

胡風是思想問題，文藝問題。三批材料不足以證明胡風是反革命。胡風反革命行動沒有什麼表現。法制不健全。黨中央有宗派主義，排擠胡風。

鳴放應當站在兩個立場上，同一個立場就沒有什麼可鳴可放的了。

對劉校長報告感到很奇怪，為什麼一下子由內部矛盾變成敵我矛盾？算了，以後不提什麼意見了，也無心參加反右派鬥爭，到底有沒有右派還成問題，黨在故弄玄虛。

人民日報社論阻止鳴放，工人知識不足，頭腦簡單（指“工人說話了”一文），懷疑黨是否有決心改正錯誤，黨員在整風中作群眾的尾巴，為什麼黨員不給黨提意見？

大鳴大放，將來免不了有第二次肅反，那時誰能保證不是被斗對象。

關於盧郁文的匿名信事件，章說：“你們不要相信，信還知是誰寫的呢？”

學生貼大字報是進入新的歷史範疇，有“五四”精神。

在剛開始反右派時，他認為：“教師中問題不比學生問題少，不談出來，問題仍然存在。”認為“鳴放連開始都沒有開始，人民日報社論結論過早。黨天下確實有事實，問題還沒有繼續暴露，不說也在腦子裡存在。助教不敢鳴放有問題，怕把飯碗砸了。

物理系助教 陳本敬

大鳴大放時說“這下要變天了，民主黨派上台，共產黨會逐漸擠下去，共產黨的革命任務已完成”。“出大字報的目的在于為第二個五四運動出把力”。“要搞垮共產黨不能用武力，也不能用政權，只有順着他，捧他，讓他腐化，逐漸人們心心相印，不擁護他的時候，一搞就垮”。“我實在不是搞社會科學的，不然我將要研究到共產主義是否還有另一條道路，我想國外一定有人研究這問題”。“搞政治太危險，斗不過別人就會完蛋，只有搞自然科學的人好，不管什麼社會也不會太壞”。

“鐵托的談話是對的，中國和蘇聯都是把馬列主義學教條了，斯大林也是這教條主義產生的。開學習‘再論’的會大家都不說心裡話，只能說好的去粉飾太平”。“學習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再論’學了壓不服大家，又來了一個新花樣。內部矛盾主要產生於共產黨腐化，脫離了人民”。

“我覺得共產黨員會看事，知道自己的政策不對，這下可以來一個的合乎人民需要的大鳴大放，將來大概會自由得多了”。“我幻想過民主黨派以後與共產黨對峙，共產黨就不能‘一黨專政’了”。

“在反右派開始時我認為共產黨要花樣，故意製造一個恐嚇信，以

作反右派的藉口。有沒有黨天下共產黨應自己檢查，看全國失業的人口中有沒有一個黨員？再看留蘇學生中又有多少是黨員？右派分子一個個被打下去了心中還不勝惋惜”。“共產黨是以力服人，不讓人民說話，所以人民就象康熙皇帝，處處說他是當家作主，但一句話也不敢說，黨好比慈禧太后，積極分子好比李蓮英”。“現在的右派分子認錯是不得已，象加利略的教會里認錯一樣”。“現在什麼事都是引經據典，要依據馬列主義，正象中世紀時引用聖經一樣”。“元朝時將人民鎮壓得那樣厲害也維持了七十年，何況現在只有幾個知識分子反對，共產黨也至少得三百年”。“共產黨的革命任務已經完成，將來的發展或者是共產黨來合乎人民要求，制定出新的制度，這樣也可以繼續成為革命的領導者把，否則將會被民主黨派擠下去，自己也願為這樣運動出把力”。

“共產黨要花樣，先要人提意見，現在又來整，這是釣金龜，我連報都不願意看”。

“‘第二個五四運動’將會對中國有很大的改變，科學上也將得到改變，心里幻想校委治校，否定黨委制。科學院說不定也會下放到學校來，象別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大學是科學文化的中心。我認為共產黨沒有能力領導才走了以前的一段彎路”。“以後學生的培養專門選擇天才生”。“以後將開放人才及儀器的自由市場”。

“解放後科學沒有發展”。“外行領導內行，把科學搞得一團糟”。

“南開大學固體專門化是非重點的六次方”。

“黨團員沒有什麼了不起，就是他們什麼都不行，才找依靠的”。

“團員不如我，還配得上管我”。“我聽同有一個同學說：管得這樣緊，真象希特勒一樣”。“大家都裝腔作勢，沒有人情，我甚至討厭國營商店的售貨員”。“少先隊也是將來的‘壓迫階級’”。

他對兩個右派分子說“很多品質壞的人，都善于走政治路線，不過你們不要被黨團員知道了，否則給你記下來，到一天算總帳”。

“黨員團員是新型的剝削階級”。“黨團員是新的壓迫階級”。

“希望以後發展黨團員，注意道德品質，品質不好的人不要吸收”。

“人與人之間沒有感情，我贊同右派分子丁守欽搬來的大學報中羅蘭的

話：‘現在沒有伸張正義的人’，對任何事務都可懷疑。我很同情林希翹”。

“好好工作的人現在都認為是壞人，不好好工作的人只要走政治路錢也會到處吃香”。

“虛無主義是什麼？青年人好像是屬於虛偽主義，小資產階級的暴露”。

“新社會沒有自由、沒有民主”。“說話也要提防，否則要被出賣”。“在政治空氣濃厚的學校上學就學不好”。

“新社會與人與人之間沒有溫暖，沒有友誼，我感到孤苦伶仃”。“在新社會沒有拔刀相助的人”。

“我很討厭學政治課，它把學生時間都耽誤了，馬列主義根本沒有用處，我背都背得下來，但從來都沒有用過”。

“我對專門搞政治的人沒有同情心，但對學生有，如人大之林某，我就懷疑她是否發現了真理，而扣他一個毒草的名，我認為應讓他成長，比如對政治課有什麼不可以懷疑呢？任何事物都可以懷疑”。“把馬列主義做為指導思想是荒謬的”。

“在肅反時有些人明知有錯不敢講，現在也可能有這種情形，應該改變這種情況”。

“不得了，每年都要搞運動，浪費不少時間，還能搞什麼科學研究”？

“右派就是右派，有什麼了不起，頂多升不了級，少拿點工資”。

陳本敬、閻樹棟、章迺漢反動小集團的兩張大字報

第一張大字報：

1. 反對外行領導內行。
2. 要求人事材料公開。
3. 要求有科學研究及圖書、儀器。
4. 要求重視青年教師。
5. 要國務院像重視工業一樣的重視科學。
6. 反對將工農速中的學生保送入大學。

7. 反對黨團員有特殊權利的大裙帶關係。

第二張大字報：

人民呼聲

爭自由、爭民主、爭人權

打碎黑權撕破黑帶，反對愚民政策，實行信仰自由，支持同學的意見，選修政治課。

要求通過真正的民主，選舉人民代表；反對包辦式的選舉制。

對祖國科學事業負責，對青年負責；反對留助教，派留學生、升等升級，開課重德不重才的卑鄙制度。

給青年助教以合理工資待遇。反對把頭制；不學無術的人退出學校的領導地位。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們不要沉默了，讓我們參加到同學們的鬥爭行列中去！

物理系助教研究生 蔡戴熙、靳健、

楊福徵反動小集團

（一）大字報

（1）“我們要擴大民主”：

1. 胡風是不是反革命？據現有的材料不足以證明為反革命。
2. 對高饒事件，我們知道的更少，這樣我們也沒有辦法確定是不是反革命？

3. 反對搞思想工作中“以力服人”粗暴辦法教育人們！不要把抱有“正流”觀念不同見解的人，看作異教徒，而施以各種形式的壓力。

（2）“嗚呼！大失所望”

1. 嗚呼！大失所望！黨委的整風計劃在那里？決心在那里？
2. 我們要重新對肅反進行估價。
3. 學生會應真正的代表同學們的意見。
4. 立即召開全校師生職工大會，保證言論自由，決不報復打擊。

5. 立刻开辟大礼堂作为自由讲坛。

(3) 答數四的幾位同學

① 关于“高饒”問題的进一步闡述：

要求对这一事件作进一步說明，怎能說是命令党这样或那样呢？

正如物一同学所指的那样党和行政，是有区别的，党內的事情不应和行政的事情混为一談，党可以处分一个党员（开除党籍）但是作为一个公民，而且过去是领导人被定罪被解除行政职务难道这只是党內的事情嗎？另外一些公民就不能过問嗎？过問了就一定一个命令党“这样那样”的罪嗎？

② 关于北大校友来校問題

对这一事件看法是一个公民的权利你們无权干涉，至于說北大校友来校这和我們有什么关系？

③ 我校的領導沒有“以力服人”的事嗎？你們四年來遇到的尽是“以理服人”嗎？可举的例子太多啦，順笔写来；

(1) 思想改造时剛回国的满腔热情的某教授（是个博士学位的获得者）由于工作不細緻方式粗暴，弄的精神失常，到現在不能开課这不是“以力服人”嗎？

(2) 肃反中我班班长被一口咬定是反革命分子，制造一些虛假的罪名（他曾檢舉別人的材料，結果被肃委会压下，反扣假檢舉大帽）結果証明斗錯了。是不是“以力服人”？

物理系助教及研究生

曹賢康 黃學崇 徐元上 譚華鐸 蔡戴熙 楊福徵

靳 健 錢燦圭

(二) 蔡戴熙

“我們的人权自由是沒有完全受到保証的。肃反在成績和錯誤的估計上，我認有成績是小的，錯誤是大的，化学系在肃反中斗了百分之四十，結果反革命是个“零”（按：与事实完全不符），随便斗人是侵犯人权的”“我們是不自由的，在肃反中組織上叫我們斗，我們相信組織

就斗了，如不发言的話，支署就說历史有問題。”“程京教授回祖国来，最低限度也是个爱国者，而学校則“以力服人”进行思想改造，而造成严重后果”。

“我觉得不管是香花还是毒草都没有理由阻止它。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有权利对別人的意見批評，可是如果不讓人家說話我就觉得这是压制。而且存在这么样一种倾向，觉得意見越多越好，越高興，表示整风越彻底”。

“我們不明白党中央整风鳴放的決定是否在南大也适用，馬列主义不是告訴我們要勇于暴露矛盾克服矛盾才能获得进步嗎，我們要求領導上打消顧慮，大胆支持鳴放，不要怕出乱子，群众会保护我們的社会主义的，不要認為只有几个领导干部才能保卫我們的祖国……”

“先扣帽子后批評会影响鳴放。我觉得先要讓发言者繼續闡述他的論点，我們来分析，然后再扣帽子不迟，不然誰也不敢說話。我同意給写匿名信的以有力的回击，因为这本来就只有別有用心的人才这样，偷偷摸摸的人才这样做。我認为現在應該讓儲安平繼續闡述他的論点然后再討論不迟，如果儲安平同意陈新桂对他的論点的發揮，那末儲的发言是属于反社会主义的，如果这样我就同意对他扣这个帽子”。

“現在思想沒有自由，隨便說一句与領導（实际上是党）意見不一的話就得遭到有組織的群众性的批評。我想，信仰一件东西，信仰一个主义，信不信由人家，只要他不推翻政权就誰也不能斗争他，不然就是沒有自由。对于一个主义的信仰，对于某一人的要求都應該是他自願的。我要参加党，那我就对自己可以这样要求，我不参加別人就不能干涉，干涉就是言論不自由”。

“我認为沒有被告当法官。整学校，党委必須由市委出面領導及主持會議，整系一級則由已整风的校一級党委來領導，全校性的問題全校性會議解决，系級問題系級會議解决。”

“我觉得过去党的思想工作及馬列主义之教学簡單化、教条、有时甚至于粗暴。这种教条的思想教育对全校各种工作已起着重要影响，政治課教师拿着筆記本背，这样怎么不叫学生思想僵化呢？从这次譚天榮

来校演講可以充分看出来：对譚天榮的錯誤論點一般的只能給予給个习惯的大帽子，大声嚇嚇二句就算在和人家爭論，而不能你来哲学我用哲学批判。你来具体东西我拿具体东西批判，这样才能使人心服口服。”

“我認为新的說法是正确的。我校肃反成績是小的，錯誤是大的，人权的确没有受到充分保障，但是这并不等于說当时被斗争者的本身一点問題也沒有，这一点要分开。說成績是小的主要是因为它这样做是把不是反革命也一起搞了。我觉得按徐溫元先生剛才講的关于工厂如何措置肃反問題（先調查到已經有百分之八九十之后再進行斗争……）这种做法才是对的，像我們学校就不是这样，未确定前又說材料已經完全掌握但結果又不是反革命，过种斗争与审讯何異呢？”

“丁的意思認为工人出来說話是不民主，对党提意見并不是对党不滿：百家爭鳴是人民內部的問題，人民日报的做法可以考虑。只有充分提問題，才能知道缺点所在。对一些恐嚇是并施加压力，在現象揭露后一定是根本問題的討論。所以必須平心靜气的討論，而不能扣帽子，讓大家將意見提出來。”

“搞錯了是搞得不够彻底。不交代，不恢复名誉，沒有安慰……如果將干部作为反革命处理，則就无人敢搞运动，如違反党的政策則应进行处理”

（三）靳 健

“我們的民主是否够了？我們的人权是否有了保障？我們感到是不够的。在宪法上、法律上是保障了，但实际上是沒有的。”“打蒼蝇可以用蝇拍，用炸彈固然也可以炸死蒼蝇，但必然要伤害別人，肃反这样作代价未免太大了。”“肃反有很多侵犯人权的……有些小組还执行‘司法任务’。”“在肃反問題上，我不同意刘付校长的意見，我認为，成績是小小的，缺点是大大的，人权是不够的，要扩大”。“如果在全国範圍內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对的，那还有百分之零点一錯的，可能是百分之一就发生在南大”。“据我們了解我校有二百五十人被斗了，而只有八个反革命……，（按：与事实不符）使二百五十人的心灵上受到創伤。”

“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过去犯了大錯，这种錯誤表现在大国沙文主义，对国内国外不民主，思想統治太严。

“世界共产主义中心——苏联，在过去很多政策是錯誤的，如外交上，各国的党和党之間的关系上，对人民的思想工作上，就必然造成当时的局面，在这以后虽然很多地方改了些，但是不够，尤其在思想工作不够。那种严重的教条主义，使人民的思想和科学艺术都硬化了。”

“政治是反覆无常，今天說东，明天就說西，而人民則只得盲目地跟着跑。如以前罵南斯拉夫，今天又說他是社会主义。以前把斯大林看成神仙，今天又說他有錯。而有人說斯大林主义，我們說是功过三七开、四六开。我心想“誰知道是怎回事”。对政治理論，我也認为是教条，所有的东西，都是从經典理論中提出某部份来作人們的这种或那种准繩。政治理論今天只是停留在背誦，解釋和讚美的阶段上，人們不敢提自己的論点，不敢从新的社会情况中去吸取內容、去补充，即或有那也只能是一些偉人，才可以这样。”

“不同意地斯大林錯誤归于群众的惡习，对于政治制度只停留在民主集中制，再进一步具体化就不是所謂的政治制度（經濟，全民所有亦相同）。斯大林之錯誤由于不健全的制度所产生，如早上六点起，但有人同时起去鍛煉这都是制度，但不能在說这个或那个制度不好，两个都去执行。个人崇拜在中国很风行，过去聯共党史整个貫穿个人崇拜思想。”

（四）楊福徵

“葛佩琦說的話不能說不对，因为他的提法有前提，如果‘三害’分子不改的話……”。

“工农的生活提高得很少，但领导干部提高得多（相差太悬殊），他們坐汽車、住洋房，这是一个新型的資產阶级（？），資產阶级是以金錢作資本，而他們是以政治作資本。”

“我恨南开一切人，恨所有的政治干部，假如我有手槍的話，要打死所有的政治干部。”

“肅反的作法太使人胆寒心驚，就是不是被肅的人也有此感，不知那一天也会搞到自己头上。”

“人民日报的‘工人说话了’的社论，是领导组织的，工人的话还没有说出来，实际上受‘三害’最深的还是工人，不过他们不敢说话罢了。”

“在我们的制度下，没有民主，班干部是傀儡。”

“政治干部干涉过多，列宁不懂物理，却著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書，这本书不应当作为经典著作。”

“胡风问题是一个错误，但有意識的拿他做肅反的序曲。解放前的事不算，傅作义在解放前更反动。”

“弄疯了程京，麻痺了胡刚复，放走了王治樑。”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怎么也看不下去，对奥斯特洛夫斯基不喜欢，觉得他是吹嘘，喜欢看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我有个理论觉得人死时才说真话。活得正好的人说的话不太相信，象海鸥，拖拉机站……”

“苏联国家虽然工业很发达，但生活在那种不自由的国家也没意思。”

“我是黑种人，另一些进步的同学是白种人，因此有种族歧视存在我们之间。”

“建议整风伴随清党，希望党看到右派的大字报就清除党员，以削弱党。”

“思想改造是正统思想对待异教徒。”

× × ×
綠紙貼在紅牆上，
海报作紗窗，
有話講出来，
放在心里悶的慌。

× × ×
有意見，小組提，
群众不滿意，反映不上去，

等于放屁！

× ×
写出来，大家看这样更便当，
大家来爭鳴，百家一齐放。

× ×
紅四樓牆上有自由，
誰是誰非大家說，
帽子不要扣，整风不能收。

未有名 5.27. (楊福征的大字报)

物理系助教 丁守謙

按：丁守謙自清华园归校后，移来毒草“维护人权”、“公审胡风”、“为历史辩护”、“胡风事件再提”等四篇文章，并以观察者曼(笔名)发表了序曲，茲將它們和討論会上几次发言一并介紹如下。

又：“胡风事件再提”笔名和“序曲”一致，而丁守謙却不承認为自己的作品，但根据所揭露，丁所散布关于胡风问题的謬論与此一致，是以有足够的理由証明实属丁守謙所作。

(一) 序 曲

观察者趁此暇之余，去訪北大、清华，对这次学生运动作些观察，所接触的人物甚众，所获悉的材料也頗多，为刚刚所知，故暂按下不表。

在清华园的水利館上，貼有四份引人注目的大字报，計有“维护人权”、“公审胡风”、“为历史辩护”、“胡风事件再提”观众絡繹不絕。这几篇文章具有一定的理論水平，并据有較广泛的代表意义，而且据有辯論家的风格(不象詭辯論者或暴力論者那样)(指蛮不講理之意請勿誤解)。而他本身的若干論点，又受到清华校友當場反駁，好一番熱鬧景象！为避免断章取义，特將原文全部抄下，以飽看官們的眼福，

同时希望由此“抛玉引玉”(因此数文非观察者之拙作,故不能曰“抛砖引玉”),以活跃南开园的空气,的确这里的气氛比起燕园、清华园来嫌太“死寂”了一点。

为了不影响“看官们”的独立思考,“观察者”只将原文介绍,暂不发表评论,这并不意味着“观察者”没有自己的“管见”,本着“真理愈辩愈明的精神”,希望将来能有数场激烈而友好的论战,“观察者”将积极参加。同时引为骄傲的是在“观察者”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中,曾有过这种光辉的范例——光的波动说和微粒说,经过三百多年的争鸣后,竟意想不到他新的基础上得到辩证的统一。

观察者 洛曼启 57.6.5.

(二) 維護人權

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反革命份子就一天不会絕跡,經常性的肃反工作和提高警惕是完全必要的。

在这次肃反运动的終結,領导上認為:成績是主要的,缺点是个別的。但是在我們所了解的三个單位——清华、北大、东北工学院这次被斗、被关、被污蔑、被施以精神拷問的人后来查明有 90% 以上都是好人。譬如北京大学史夢蘭曾宣布反革命份子为百分之几(当然肃反領导不会蠢到規定每个部門都不折不扣地达到百分之五的指数),但是当时宣布这个数字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的效果如何?事实証明很多單位被斗被关的人正好都是百分之几(見最近几周的人民日报)。六亿人口的 5%,就是三千万,請問短短几个月中全国有百万千万人被斗,被关、被施以精神拷問,而絕大多数是冤枉的,这叫做缺点是个別的吗?不!这叫做掩耳盜鈴,自欺欺人!

問題的严重性不仅在于冤枉的人众多,而且由于它性質的恶劣,人权被蹂躪,宪法被踐踏,法制蕩然,正义无存。

宪法規定:“通信秘密受保护”,請問千万人的信件被非法檢查,很多人失去了通信自由,有誰来保护法律,保护我們不受毀謗,可是在肃反期間,調查人們历史时,在亲戚朋友中被誣指为反革命分子的人有

多少?!

法律規定被逮捕的人24小时之内必須送法院,48小时内必須決定是否起訴,但是肃反期間被关的人們你們沒有看到逮捕狀,关了48小时还是4800小时。

是的,我們沒有体刑,但是經年禁閉,日夜追逼,捏造事实,誣告恐嚇的人有多少?!多少顆滿怀着青春希望的心,从此沒有了春天,多少双願为社会主义劳动的手,从此麻木而迟頓,多少对情侶被拆散,多少家庭被破坏,多少人至今还禁若寒蟬!还有那些被迫自杀者的鮮血——我們同志的鮮血——想起了令人心疼,他們的血不流在保卫祖國的疆場上,而被自己人杀害。

宪法在那里,人权在那里。

“缺点嗎?嘿!这不过是个別的”。这是彻头彻尾的謊話,它的效果是掩飾那些侵犯人权的份子。

“有反必肃”做得很坚决,我們双手拥护。

“有錯必糾”为什么直到今天还吞吞吐吐,欲做还休,是为了保护干部的积极性不受损伤嗎?是的,有許多忠誠的工农出身的干部,他們还不太了解人权的尊严,还不习惯按法律办事,这种人即使委屈了我們,也可以不究既往,但是在肃反中,有不少人是不在此例的,他們挾私仇而捏造事实,捕风捉影,誣陷好人,務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他們藉此来挾持群众,大显身手,激动谄媚,把別人的血泪作为自己进身的阶梯,他們不在肃反,而在肃好人,不是救国,而是害国,他們是中国的蠹賊,不惩办这些蠹賊,不足以慰地下清白的灵魂,不足以維持宪法的尊严,还有在肃反以后,揣之自危,不敢說話,道理就在于他們目睹許多罪名是莫須有的,所以明知清白,誰敢去懼“莫須有”的刃鋒。簡單的說他們感到公民权利还没有切实的保障。

我是一个普通的青年团员,我爱我的国家,中华民族受尽了磨難,几千年来向來是沒有人权的。解放了好容易爭得了人权,我們不容許这班蠹賊再来破坏它。要知道誣害拉伊克,也害了匈牙利,誣告列宁格勒的医生,不但害了这些医生,也損害了苏联,我国的許多違法乱紀份子

不仅害了许多被诬告者，同样地也使得更多的好人谨小慎微，不敢讲话，不敢负责，一部份有利于学术建设，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因此不能发挥。所以这班蠢贼，是我国民族罪人。维护人权事业也决不是百分之几被害者的事，而是每个人的公民权利有无保障的事。这是全民族的事，是我国社会生活的根本问题之一。

还有我们应当进一步想一想肃反期间，全国那一个地方没有私设的没有法律根据的禁闭室，那一天没有非法的通信检查，精神拷问；如果没有肃反最高领导方面的默许或纵属，下级干部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怎么会如此步调一致？而且不是肃反最高的负责人谁有这么大的胆，竟敢如此主观而谬误的估计全国反革命份子有百分之几？有谁敢于把这个数字广为传播，定为大家的学习材料，肃反期间的严重错误是有其理论根据的，即社会主义革命愈深入，阶级斗争愈尖锐（见55年6月7日罗瑞卿的“提高警惕，反对麻痹”的报告），但是闭着眼睛，不看事实，瞎套理论，闢下了这么大的祸之后，把责任完全推给了一个死了四年的苏联人就完了吗？

据此，我要求：

（1）重新估价肃反运动，拿出数字来。

（2）尊重人权，尊重法制，作为重要项目，列入党和政府的整风内容，务使每个真正的公民受到切实的（而不仅是条文上的）法律保障。

（3）从速建立尚不完备的法制。

（4）设立独立的（而不是原班人马控制的）有实权的国家接待室，受理有关违反法制人权的控告，下决心惩办别有用心诬告分子，违法乱纪分子（动机纯良者不在此例）凡是藉打击好人而入党的必须开除，凡是靠打击好人而升级者，必须降级。

（5）具体负责肃反的高级领导人必须引咎辞职，应负污蔑宪法的责任。

（6）被污蔑的好人（无论生者或死者）必须在与当初“斗争会”相同的会议上为他们洗刷清白，调查对信口雌黄，血口喷人，以致引起

误解，必须彻底弄清，道歉云云则大可不必。

非如此，不足以正国纪，非如此，不足以申正义，非如此，不足以提高党的威信。

罗 蘭

（三）公審胡風

胡风案件，曾掀起了全国性的运动，我们都曾参加过这个运动，但是我始终觉得仅仅把公布的材料来证明胡风集团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是很不充分的。

反胡风文件，汗牛充栋，不可胜数。其中最重要的是胡风集团的信件及其按语，我们试温好一下，

1. “信中……我们会胜利，但那过程并不简单罢，我想，还得更沉着，更用力，以五年为期并不悲观。小利要弄得有点才是……（50年初的信）“磨我的剑……窥伺方向”“且打滚，且作战”

他们所谓方向是什么，所谓进攻胜利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解答，是判定胡风集团性质的根本关键，而“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中（以后简称“材料”）按语说，他们进攻的对象是革命，是人民政权，而反革命复辟的时期需要五年”但是纵观全篇材料，这种判断是欠缺直接根据的：（相隔差不多就是五年）。

“这里情况在动摇中，第一，作协党组连日来在开会，大概由先生们自己检查，提出汇报，中央再来最后考虑问题……甚至（胡风）给中央二十万字的东西要出版了，如果真是这样，大概是上面已经决定了要彻底考虑（P78）“缺口已打开了（缺口指作协检查文艺报的错误）”（79）“我发了言，文艺报的问题不是孤立的，为领导“倾向表现之一的庸俗社会学，美学上表现之一是形式主义，（P80）宗派和军阀统治。

可见他们反对的是当时文艺领导占统治地位的文艺理论。他们进攻的直接对象是这些，这是无疑义的。他们的目的有没有可能是藉错误的文艺理论，错误的作家组织方法来戕害文艺界，来损害革命呢？是的，有可能，但从材料中找不出直接的根据。相反的，如果你仔细的研究一下

胡风的“二十万言”再留心一下整风以来各文艺刊物上的讨论和批评，你会发现胡风的许多意见今天正在讨论中，并不是大逆不道的东西，他的有些主张，我已经采纳，而且，如果胡风的最終目的是推翻人民民主政权，那么他要写“如果他（周恩来）和你见面（谢韬）你的意见也会对他有影响的（P66）”为什么他要以给党中央的报告作为斗争的主要武器呢？为什么他极力争取中央的支持呢，这需要解释。

所以持着科学的态度看这些话，应当说明胡风集团的目的可能是反对人民民主专政，也可能只是为了实现他们的文艺理想，这需要进一步探讨才能下断语，这个大前提既如此，那么胡风集团用那些刻薄鄙人语以及偷看党内文件也就并不可能为反革命目的服务，而可能是他的不择手段或品质的恶劣。

2. 政治历史问题：

在解放前利用私人关系保出某一个被逮捕的人是常事，故胡风保出贾植芳也并不稀奇。

……阿端、綠原、方然曾是反革命，但材料并没有说出究竟干了那些罪愆勾当，说胡风在日本时干了些不可告人之勾当（P59），我们知道蒋介石的一切政治工作都是从建立买办官僚专政为目的，都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但是这里按着具体的活动、职位，出入很大，仅说“反共工作”“不可告人”未免过于笼统，而且胡风集团人数很多，不等于反革命集团。

3. 已公布的最重要的分析胡风集团罪行的材料是“按语”，但是，这里有些地方还值得商榷，兹举一例……今天中国，人还是不遵敬人的，人还是污损人的。“而按语分析为上人指革命的人，下人指反革命的”（P123）这种按语是为胡风集团反革命的罪行的分析提出来的，也是我们当时我们学习的材料，如果有人责备我们深文周纳，故入人罪，我们将何以对，如果把它公诸于全世界，岂不为仇我者作把柄，为亲我者痛心。

4. 有人说：胡风若不组织集团，也是可以争鸣的，这种说法似乎不尽恰当，要知道集团二字本身不是什么坏字眼；分散的人进行反革命活动，我们不因他是个人不叫他反革命。同样，不以反革命为目的集团也

不能因它是集团而叫它为反革命，不在于“集团”或“个人”而在于活动的目的。在二十世纪，要贯彻任何一种主张，实现任何一种理想，没有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努力是不可能的，宪法规定人民有结社自由，只要不是反革命有何不可。

总之，在胡风周围，曾聚集了一个宗派主义的集团，他们有自己的文艺理想，反对当时文艺界的另一部分人，并且用词极为刻薄，缺乏同志式的态度，这是可以肯定的；至于“反革命”他们有嫌疑，有重大的嫌疑，但是已经公布的材料却不足以构成充分的法律根据——这是我的看法。

六十年以前法国有个炮兵尉官叫德莱菲斯的，被陆军当局诬告为德国间谍，被判在魔鬼岛上终身监禁，判刑的根据是不充分的，在法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全国分为两派，一派硬说是德国间谍，一派则主张彻底调查，重新宣判，多少人与这小小的下级军官无亲无故，放下了自己的工作，甚至丢掉了自己的职位，为他奔走呼吁，伟大的作家爱弥儿·左拉、安那托儿·法郎士都奋起主持正义，左拉因此被判徒刑，迫得他逃到英国去，为此被迫逃亡的人不知有多少，经历了十二年之久，经历了无数波折，冤狱终于平反，德莱菲斯的确是清白无辜的，法国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不要它，但是法国人这种追求真理，为正义前仆后继，不惜牺牲的精神是伟大的，当然任何比喻都有些跛足的，我无意于把胡风比作德莱菲斯，更无意于把人民民主政权比为资产阶级政府，在“反胡风”学习中（或者在斗争某一个人时）明明白白有些历史清清白白的人，他们都口是心非随波逐流，连哼都不敢哼一声，这种斤斤于个人安危，不去探求真理的心理是知识分子的耻辱，是我国的可忧虑的现象（斯大林后期的错误，苏共中央委员会不是不知道，但是象赫鲁晓夫这样有魄力，有勇气的人都觉得对此无能为力，为什么一个全国性的错误在一个长的历史期中二万万苏联公民中竟没有一个看出错误，竟没有一个有勇气指出错误！这难道不也是可忧虑的现象吗？毫无问题生产资料公有化没有错，现代化的生产也要求一定的自上而下的领导，错在那里呢？这是值得深思的，有暇我当发表我的看法。

有遠見的人士將會看到，胡風問題的徹底解決——即拿出確鑿的證據來重重地判他反革命罪，或者確是宗派集團，判他刑事罪（如果有的話）——這對於廣開言路釋群疑，解除許多不敢講話的人的顧慮，將會有莫大的好處，據此，我要求：及早公布起訴的全部根據。

公開審判胡風！

我得知寫按語的決非等閑之輩，我也深深地敬愛拯救中國於水火之中的革命領袖，但是真理不許我緘默。我當然歡迎支持我的同志，但如果有誰能駁倒我的論點，把我的疑團解除，我將至為感激。但是在“駁”以前，多請先冷靜的重讀一下“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胡風對文藝問題的意見”（即卅萬言）（曾公開發行）以及最近的文藝問題討論，這樣才会有討論的基礎。

（四）為歷史辯護

——致羅蘭同志——

任何歷史時期的任何政黨（包括共產黨）都採用必要的手段來對付它的反動派。這是由歷史本身所證明了的。

如証據確鑿胡風是反革命，那無話可說，如果証據不夠，法律學上不能構成胡風的罪行那同樣無話可說，我的理由如下。

一、胡風的組織發展到幾百人，在社會動亂時期霸佔文壇控制了部分出版事業（如臧克家的詩集要牛漢批准才准發表）即使它是文藝流派但已在事實上成為反革命的絆腳石，野心昭然若揭，因之執政黨可用暴力的辦法拔掉它，不受法律條文的約束（甚至憲法）歷史上這種事情屢見不鮮，然而崇拜法律的人，看不到這個社會規律，看不到黨派及階級鬥爭的超法律性。

二、作為統治階級，有它的共同的和不同的性格，它的共同性格之一就是在取得政權之初，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來消滅并鎮壓反對派，以確保自己的天下，正因為迅速，而且殘酷，所以冤死鬼必不可免，如果懂得這個規律，他們在九泉之下，應該欣然瞑目，共產黨比任何一個朝代的統治者都要偉大，因為這個朝代冤死鬼最少，而又是為了大多數人的而死的……在蘇聯曾經有個同樣理論的人，結果也不辜被捕，不

知是否他曾愉快地死去“見斯大林時代”一書“文匯報（3月份）有節譯，請人們看一看迭更斯的双城記”，再看看中國史書和西洋史書，就要摸透革命過程的特性，惺然醒悟而不激，怒髮沖冠得帽子都要飛了。

三、政治生活是冷酷无情的，它往往用藍色的手段，來達到紅色的目的，它排斥人道主義和人權……等糊塗到聳人聽聞的說法，請問諸位，聽到那位共產黨員同志說過“人道”和“人權”這樣的話嗎？沒有，因為執政黨是不相信“托爾斯泰主義中的愛和善的意旨”，而只相信馬列主義。

（但提倡革命的人道主義也就是從托爾斯泰，羅曼，羅蘭，高爾基的作品中吸取來的，請新校友評）

四、近來文藝界的討論，似乎重調了某些胡風的看法，（如導演中心，制片小組，刊物獨立等都是與胡風意見書暗合）但這是反文藝界自發要求呢？還是胡風的功勞或者是故意說成是黨的政策？却不甚了解，有待於討論。

此致

敬札

（我已看過了有關材料）

S. C. 2月30日

註：上面的評語有的寫評語者弄在當場發表了演說，闡述了他們的評語。

（五）胡風事件再提

……但繼之以後，只有一個逮捕狀作為結語，沒有辦法作為結束。

第三批材料證明胡風和阿龍，綠原，方然……（以前干過反革命的）有過通信關係和其他關係，但是我反對用“連坐法”的法律方式來滿門抄斬。“……羅蘭有充分的理由來懷疑，因為他是一個不明真象者，當然他對摘帽子是無能為力的，所以他本人提出公審胡風是及時的。”

我們不願意只知其家，而不知其國，我們要管國家的一切事務，

使“国家的主人”这个字眼更充实。

胡风在以前在文艺理論上是和一些黨員及一些人的意見是分岐的，他自己曾說“我年青时候痛切地感到庸俗的机械論的危害，因而在創造實現中，追求用新的现实主义，用新的方法研究社会主义，所以他特別反对何其芳，林默涵，周揚等人的文艺观点，而且他們在感情上也是不太融洽的，这些可以反映在材料的一些信札中，他在重庆搞文艺工作时，他反对一些只适合于解放区的文艺理論，因而他們之間在现实主义和社会现实主义之間創作方法和世界觀之間发生了激烈的論战，他的观点是与一些黨員作家有分歧的。（这些在現在看来是不足为奇的，而且鼓励这种爭鳴精神，但是在第一批材料中，就指責为“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运动，教条主义者就从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邏輯来加于反对者的头上，可是胡风在同他們的論战中，并没有对整个党的瘋狂攻击，而只是对几个黨員作家进行学术性的辯論。

正因为胡风沒有追随某些教条主义者，所以自己在探求对现实主义新的理論上考虑了一些問題，也就有一套新的看法，要在創作實踐中达到馬克思主义者。在群众中起了一定的影响。在實踐中有一定的存在价值，可惜却被人指責为“披着馬列主义外衣的陰謀家，”假如馬克斯主义者是真貨，它是战斗的，决不是教条主义，那么自己以为是真貨馬列主义就大胆跑出来战斗，决个你雌舌雄。但是一些教条主义者没有这么作（解放前作过）解放后只运用統治的棍子来对具有反面意見的人照打，这現象是极普遍的。解放后，胡风虽然在北京工作，但是在某些領導者心中还是个異己分子，在1953年进行知識分子改造时，何其芳、林默涵二人写了兩篇文章批判了他的文艺观点，以后他也作了書面檢討，但是某些領導者从領導地位，非但沒相互帮助，相互学习，却对他另眼相对，他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产生了一种不正确的宗派情緒（以前已有，人較少）收集了一些文艺观点相同的人（当然也摻雜了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也由于党的宗派主义較濃，所以他的宗派情緒更有发展。不过在1953—1954年底由于林、何的兩篇文章，他的确就当前文艺界面臨的問題作了研究，因而也較深入較全面地写了长卅万字的意見書，

（包括林、何的反对，批評和工作建議）在态度上还是真誠的。意見面前記中說把林、何兩同志的批評的反批評和我对党的态度完全区别开来，完全用的是討論問題的彼此学习的同志态度，这意見書上提出的問題大家表現在今天的文艺界，这些是他早已預料到的。設想一个敌人，他能发现党的缺点，能非常真切的誠懇的，毫无顧慮的提出嗎？但是碰了壁，只能写“我的自我批判”来遮盖迎面的打击；更出其所料的竟突然来一傾天的陣來雨，响震霹，当头棒，給打得死亡的。

我所以有这样的疑难，主要是从上面事实分析中有这么一个可能性，就是胡风和某些黨員有不同意見，而这部份人的理論是帶有教条主义色彩的，而且在文坛上佔統治地位，拿胡风的話，就是庸俗的机械論者。他們是党的文艺工作的領導者，一直以馬列主义自封，自以为是毛澤东思想的註釋，他們建立了一整套理論，但是他們的理論（包括林、何）对当前文艺发展起着一定的危害作用。公式化、概念化；普遍在作品中存在，这不能只看作一种現象，而有其深刻原因的，文艺界爭鳴中所暴露的問題也說明这一点。正因为及时地預見到了这些問題，所以建議也确实击中了要害，触及了瘡疤，因而必引起以前的敌对者，現在的領導者，确切地說是一些官僚主义者，教条主义者的慘痛，就認為有对立情緒，而掄起了統治者的棍子，不死你也甯想活，这种可能性，我提出来也觉得有些冒昧，因为可能有些主管人握有鉄証，我就啞口无言了。

不过仅仅这三批材料要信服人是办不到的，而且对这些信札的来源我也一直在猜疑，終于联想起我近傍那些偷看信件，迫人交出日記的卑劣行为的人，但是尽量克制这种联想，因为在这光明磊落的时代与这种行为是受抵制的。

当然这篇文章唯一建立的基础是一个假設，假設是人民内部矛盾，我再強調一遍这假設，若是假設成立，那么胡风事件倒是一出“三害主演的令人瞠目的悲剧”，否則这篇文章也只当罷論了，我衷心地希望它作罷論，但是最迫切的希望还是要求公佈胡风事件真相。

洛 曼

(六) 答同志們問

关于胡风問題我的思想是从学习“传达毛主席的报告”时开始的。那时談到人民內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問題时，我首先有这样的問題不清楚：胡风是由人民內部矛盾轉化为敌我矛盾的呢？还是本来就是敌我矛盾？我在小組討論上曾提过此問題，但没有得到解答。同时还想到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政策中鮮花和毒草都可以放，胡风是不是亦有可能只是一个毒草呢？是不是有可能在当时將人民內部矛盾錯誤地搞成为敌我矛盾的呢？在毛主席的报告以前，关于人民內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問題在有些人的思想中是不象經過他分析后那样清楚的，我覺得这些個題可以重新考虑一下，才更能明辨是非分清敌我，后来整风运动开始，看到有的人大字报亦提过此問題。在这时期，恰好因公去北大兩次，而且只有兩次，一次是到北大去听一門新开的課，一次是应北大物理系、电子物理教研組的邀請作了一次科学报告（这里說清楚一点，以免同志們怀疑我專門是为抄此大字报而去的），順便到清华大学一趟，（那里音乐室的先生們我是很熟习的）。恰好看見有許多人在看新水和館上所貼的几份大字报，（决不是光知道有此大字报而去的），我看到“公审胡风”“胡风事件再提”兩篇，对胡风問題的怀疑，說得很有道理，在內心上起了一些共鳴，并認為反駁的那篇（即“为历史辯护”）有些論点則不够充分，（当时反駁的文章就此一篇），同时我还感到双方討論問題的态度是很好，我当时認為既然很有“道理”，态度又“很好”，所以也就积极地决定介紹到南开園来，作者自己曾經怀疑过的胡风問題的一些充分的理論根据，在此大鳴大放之济可以用来活躍一下南开園的爭鳴空气！真理是愈辯愈明的，同时还早有过將校外情况向校內介紹的先例。所以这种作法在当时也就認為很自然的了，决无想借此来打乱整风步驟之意，因早就有人提过……并討論过此問題了，文章是第一次到北京时介紹来的，一个多星期以后，我就到北京去作科学报告，原先打算在南大如有什么胡风問題討論会时，口头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評論，后由于作科学报告需要一些准备，時間很緊湊，也就沒有写什么評論了。在“清华

園見聞”上而有人提的意見是希將此文向全校介紹，印发給大家等。沒有人要我写評論之类也就这么拖下去沒写了，所以上次回答說：“拿不出成品来”，是完全真实的，假若是“順則进、逆則退”的說，这長時間并沒有看到有什么質問之类的話，提的意見都是認為介紹此文是很好。有成品的话在当时要发表是不会有什麼顧慮的，幸喜沒写什么評論之类，否則对那时讀者們思想中更会起一些坏作用。

現在回头來談所起的影响，在我將这篇文章介紹到南大时（其中有一篇“为历史辯护”）不能算是右派言論的，由于自己政治覺悟不高，沒有看出当时右派言論正占上风，介紹此文章來时，更助长了声势，造成了一部分看此小字报的同志們思想上的混乱，我应負此責任。这是分为遺憾的，所以希望同志們今后对这些論点多加批判、分析。自己亦主观地努力消除这些后果。

这里，我也不得不坦白地告訴大家：我对文章的一些論点經過一些分析研究后看了一些參考材料，除贊成他們的一些基本論点外，竟然还多生出一些問題來，为暴露自己的思想使同志們能够更好的帮助我分析、批判現略举几点。按照第三批材料所說的胡风很早就就是党的忠实走狗和帝国主义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潛藏在人民內部干着反革命勾当。而在何其芳同志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中說过，胡风同志很早就就是参加革命文艺活动的文艺工作者，他一直坚持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的立場这是首先肯定的，在林默涵、周揚对胡风的一些批評中也說过这类的話，当然这句话是在揭露他之前說的，所謂立場一定是由一些行动換得的。当然不能是假裝的，但是这也說明了他至少在客觀上（代表面上）对革命起了一些好的效果，也就是对美蔣不利。但在三批材料中到底对革命起了多大的破坏作用在材料中是說得不太充分而明了的，和特务机关的密切联系，在这些密信中也并不是頂充分而明了的。美蔣为什么这么蠢，花这样大的代价讓他长期潛伏地干着那些本可以公开來活动而得到的目的，这样就可以消除在群众中几十年来對他們本身极为不利的反蔣、反帝、反封建的言論，这是很难理解的，何况他們根本上也沒有想到他們的王朝有一天被人民的

鉄拳击碎而預先来一个“复辟”之类的作法呢？

同时这三批材料中似乎很难找出一处絕對不能用人民内部矛盾而只有用敌我矛盾才能解釋得通的事，也似乎找不出他們最終想夺取政权，或將來依靠着蔣等夺取政权的充分証据，同时还必須注意到胡风事件是发生在宪法公佈以后，所以处理問題决不能象大规模的階級斗争还正在决斗的时候那样如土改和第一次鎮反时期是必須采取一些非常措施的。

材料中还有一些个别的“編者按”中亦有些不太恰当或缺乏說服力之处。

由于有这些問題的存在不能得到解决，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認為：据人民日报所公佈的三批材料不足以充分的証明胡风是反革命分子，当然这是一个危险的令人憤慨的思想，但是这也是真实的，我的思想到目前为止的确这样。所以希望同志們多加帮助，由于我的一些基本論点就是由他們的基本論点而来的，所以首先對他們一些論点能进行深刻的很有說服力的批駁，那么我的問題也就差不多解决了。

由此作为前提出发，到目前为止，我認為将来經過公审胡风分子結局会有三种可能，第一、摆出更多的更充分的鉄証来，这决不是能用人民内部矛盾来解釋得通的，三批材料也是証据，但居到次要的地位，这主要是用来教育人民，提高政治覺悟，識破兩面派手法的反革命分子之用，不是用作为証明他反革命分子的前題，而只能認為是一些重要的补充这种可能是最大的，第二种可能他是一个反动分子，有着反动文艺思想，以及一些破坏活动。但还不能叫反革命，这种可能也是有的但很小，第三种可能是当时將人民内部矛盾錯誤地判定为敌我矛盾，这也难怪，因胡风隱瞞历史，又有个小集团嫌疑极大，加上个别領導人物，还有点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及主觀主义的因素，于是錯誤地判为反革命了，而實質上胡风至少在主觀願望上是的的确拥护社会主义的，当然这种可能性就更小，但并不等于完全没有。

这儿只是上面的一些理論的推論，如上面的論点推翻了，那么这些推論就不成立，剩下就只有一个可能，不管怎样胡风必然是反革命只是罪的輕重而已。

这个問題是概括我的思想中的最主要最重大的問題，其他的問題是比較清楚的認識，为了抓着主要問題故不詳談，所以赤裸裸地告訴大家，只能算是暴露吧說不上深入認識錯誤等。希望帮助指正。

最后作二点声明：

1. 我和胡风及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任何一个人从不相識，从沒有任何联系。
2. 清华大学这几篇大字报的作者我也从不會相識，从沒有任何联系。

“附”由于一些同志們的建設和要求，將清华園見聞中关于胡风問題三篇文章重行公佈于后，以便于駁斥这些論点。

此致

敬礼

丁守謙 1957.6.

× × ×

丁守謙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

“从大家的发言里可以看出，对‘党天下’含义的不同理解，可以得到不同的結論。我認為應該首先弄清含义，才能下結論。关于这一点，应当叫儲安平尽量发言。在他沒有說清楚‘党天下’的含义之前，下結論是过早的。”

“儲安平的发言是在挖根，是在消灭三大主义，他所揭露的事实是存在的，‘三害’在共产党領導的国家中都是普遍存在的，这一点就值得我們动脑筋来想一想。”

“即使是毒草，我們也可以从中吸取一点东西，例如鴉片有毒，也还可以治病。

“对于一件事，都可以从不同方面来理解，例如一个人对我好，可以了解为友誼和关心，但也可以怀疑他是不是想拉攏我，利用我。对儲安平的发言，我們可以从另一方面来理解，应该多听听反面的意見，即是他有一套，也不要有过多的憂慮。”

“关于党和人民的关系，把党和人民等同起来，说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这在一定时期是对的，在解放前，即使是搞破坏活动，如破坏铁路等，也都是代表人民利益的。解放初期，土改、镇反、思想改造等也还代表人民的利益，但掌握了政权，成为统治的领导者，领导和被领导之间就发生了矛盾，领导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乱用了群众对党的拥护，和人民不再是共同呼吸，而发生了个别环节上的蜕化。”

“历次的农民革命也都是如此，在革命期间，这些领导者也都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受人民拥护的，但一旦取得了王位，就不再为人民利益着想，压迫起人民来了，必须认识到人民是第一性的东西，党是第二性的东西。”

“我有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三害产生的根源与具体的制度环节，难道能说没有关系？我有个想法，就是什么是群众意见，最好能用民意测验的方式，来测验一下民意。”

“比如，过去文艺报有个秘密的通信组，上面说什么，下面就有许多读者来信，表示拥护，说成这是群众意见。”

“刚才有的同志说三害的产生，有历史的根源，这样说是对的，但是三害的根源因素很多，不过，最使人感到兴趣的是现在的社会不是将三害削弱了，而是将它发展了。”

“如何将三害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问题很重要，究竟是什么因素能使它变成现实性，是值得深想的。”

“历来的一些运动传下来的工作方法，都是领导说什么，下面做什么，没有人敢反抗，下面只是体会政策而已。”

“三害的根源到底是历史根源，还是现实的根源，究竟那一个重要，要用数学算一算，就可以得出结论来。”

“官僚主义的克服，要扩大民主，例如，利用民意测验，我们还要强调，要记住，从认识论上讲，人民是第一性的，党是第二性的，人民有一定的见解，我认为是不合理的，我就发表意见，这不等于反动。”

“一长制的问题，是值得考虑的，一长制是三害根源之一。”

“关于领导，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要设一个党员作头儿，应当想一

想，是否有才能高而不放在领导地位的问题，党的领导，不应当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把每一个地方都放一个党员作头儿，例如北大器乐团，也放一个不称职的党员做头儿，象学校这样小的单位，不一定放一个党员做头儿，解放前的学生运动，实际是党领导的，但是出面领导的都不是党员，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考虑这样的领导方式。”

“有几个党员脑子里有宪法？根本不按宪法办事。”

“任何党团员都应当记住，只有官僚主义者才忘掉了一切都应当怀疑，分清是非不是怀疑派，有合理的怀疑，如我对胡风是否是反革命分子的怀疑。”

“马列主义是要发展的，要不断充实，我们也可以发展马列主义，一切要争鸣，来几个回合再下定论，修正主义也要仔细的想一下，各种流派都可以发展马列主义。”

“以前开人民代表大会，发言只有两种内容，一种是拥护，一种是检讨。”

“这次的学生运动，继承了‘五四’运动的传统，反映了‘时代’的精神，是一个伟大的运动，为什么人民日报不报导北大学生活动和大字报的情况呢？做为纯新闻也应当报导。”

“工会应代表会员的利益，现在的工会好像是文体委员会，人民日报揭露工人闹事的问题，工会应有自己的权力。”

化学系助教 方慧丽

我现在对问题看法有体会了，最根本的是立场问题，反正你站在工人阶级立场说话，什么都对。

光强调立场问题是否能发挥独立思考？

各个运动都是一套公式化，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先来个动员报告，然后讨论找典型，做总结，根本不解决问题。整风也是这样。在每次运动中，只有两种人，一部份倒霉，一部份能争取入党。争取入党的是一边倒，没有个人见解，我十分看不起这样的人。

今天講話就是明天批判、斗争你的材料。

在整风中靠党的积极份子是谁口无言，……难道党员没有看法吗？以前他们都是站在斗争最前线的，……这次为什么不提？这次整风提意见是对每个人的考验，看你是真积极还是假积极。

党员整天忙忙碌碌，不学无术。

反右派是錯誤的。现在还没有做整风总结呢，你看将来一定会把这个缺点总结进去。

平时帮助我解决思想问题的人，就是制造我的思想问题的人。

党对肃反运动中一些青年的心灵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创伤，如何弥补？

刘正之（右派分子，肃反时头发早已白了——註）被斗错了，头发都白了，人也老了。

胡风不是反革命，罗蘭的文章好，有说服力，内容凶，批驳困难。

二万五千里长征干部只能搞政治工作，不能领导高等学校。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委应彻出学校，实行民主治校制。

解放前师生关系好、密切，解放后师生关系淡薄了。

一个教师对他的学生评价的好坏，只在于他的业务，而不在于思想。

要考虑个人前途，填表时要多考虑自己的兴趣、志愿，不用考虑组织分配。过去我做团支书只能带头服从分配，结果断送了自己的前途。

念专科和提前毕业都是牺牲品。

新闻不自由，报喜不报忧。党内知道得比团内知道得多。

谭天荣有办法，能在困难的场合下说话，能独立思考，是个天才。大家没有资格去批驳他。谭天荣是高才生，他的论文早就做完，哲学系教授要他做研究生。

梁健是真正的共产党，其他党员都是木头的，太坚持原则，不发表个人见解。

化学系助教 沙昆源

攻击党的思想改造

知识分子是一个阶层，思想改造在学校不适合，尤其对老教师更不合适，所以思想改造不应该用这个方式进行。

思想改造是党打击了知识分子，副作用大，成绩少，缺点多，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不高，也由于思想改造所致，因此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党强迫改造。

陈伯达报告说：科学家的思想改造，可以通过研究科学道路进行自我改造，走向社会主义（断章取义）。如一个日本经济学家，是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正确性参加党的。

同意范扑齋的谬论，知识分子是超阶级的，党对他们应当三顾茅庐，这样知识分子才“士为知己者死”，因而把知识分子应当放在党之上。

化学系助教 邢肇基

（一）公开支持葛佩琦言论，并为葛井护和伸冤

共产党完了中国也不会亡，人家也不会亡国。党既然与各民主党派和平共存，各民主党派就应与共产党平分秋色。葛佩琦说要杀共产党，你看共产党的错误那么多，如不改，群众还不起来杀共产党的头吗？

就畅销搞糟了，故棉花、粮食、猪肉等供不应求，而宣传工作中一直讲是人民购买力提高了，其实不见得如此，如猪肉卖多或卖少，只要问一问猪肉店老板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对葛的言论可以这样来理解，也可以那样来理解，如昨天（5.31）人民日报上登载某县召开节约粮食，禁止全乡养鸡，结果在两天内全乡

把所有的雞都毒死了，人民日報要批評葛佩琦首先就得先批評自己。

（二）攻擊黨的發展工作，反對黨的領導

黨的發展工作是一種策略，發展黨員根本不是凭覺悟，而是凭需要，如黨提出知識分子政策，十二年內赶上世界科學水平後，須要知識分子就不管覺悟如何，就拉入黨內。黨不關心青年入黨問題，難道在我們青年助教當中就沒有以高陳主任覺悟更高的嗎？陳先生在業務上我服氣，在政治上我不服氣，難道陳天池先生的覺悟就比我高嗎？陳先生入黨前很關心同學，入黨後就變壞了。

同意民主治校，黨委會不學無術不能領導學校，但教授治校還不夠，還得要助教參加。

（三）攻擊黨的幹部政策

過去我不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工作了一年後現在才明白，共產黨員可以坐在桌面上和系主任要工作，落後群眾可以不服從分配，就是共青團員和積極分子最倒楣，是傻瓜，組織把他們的行李扔在水里就是水里，扔在火里就是火里。系里有宗派主義，留研究生都是黨員，共青團員要做研究生系里不答應，而史延平（黨員）可以不服從分配回校做研究生。刁傳芳凭什么到有機當助教，她不懂得業務是不學無術，不懂業務不配做有機分析工作。

（四）攻擊肅反政策

肅反擴大化，善後工作有缺點，故使被鬥爭的人長期處於孤立態度。肅反辦公室的方針是第一查反革命活動，第二查社會關係，第三查思想，都沒有問題就扣上一個自發的反革命分子。

（五）否定黨的政治思想工作

當前主要矛盾是建設社會主義與青年學術水平跟不上的矛盾，看一個同志的覺悟如何，就是看他的業務工作如何，凭政治是解決不了問題

的，解決了業務問題，就是他的覺悟的表現，業務即政治，因此他反對系黨支部的：“目前青年教師主要是政治與業務的矛盾，故要求青年教師做的社會工作，關心國內外大事”的分析，并認為陳天池先生是以教育者自居，教條主義。

階級分析方法，對階級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一種負擔，是個包袱，使他們積極性不能提高。過去組織上老說我個人主義、自高自大，資產階級影響，但我又不知如何背叛家庭，反感很大，目前國內主要矛盾為人民內部矛盾，強調階級分析不利。

（六）反對資產階級改造，同意章乃器、李康年的言論

工廠既然被拿走了，資產階級就沒有兩面性，同意定息二十年，李康年的工廠值多少，國家就應拿多少，這樣才是真正的贖買。

（七）其他

上街看到流入城市的農民討飯做乞丐，其他城市也有，統購是農民把糧食賣給國家，統銷是國家把糧食賣給農民。

解放軍工資太高，高級幹部與群眾生活相差太遠。現在說生活苦，叫我吃糠都可以，可是要大家一起吃，要大家一起苦，不要有人吃糠，有人錢化不了。解放軍以錢引誘中學生，小城市、農村姑娘。

青年助教不敢鬧工資問題，否則扣一個帽子，其實老教授、高級幹部鬧的才厲害。

生物系輔助員 李崇熹

（一）攻擊黨的領導

“我們中國共產黨很聰明，接受匈牙利事件教訓，提出擴大民主、百家爭鳴等方針。這是在人民群眾的逼迫下提出的，再不這樣，黨就壓服不下去了”。（“再論”學習時說）

“党今天号召大家‘齐放’和‘争鸣’，不能不叫我怀疑，回忆过去几年不满党的言论，儘管这些言论是正确的，都挨了大棒。共产党要想整一个人（往往是为了完成阶级斗争‘任务’或其他），这个人就成了斗争的牺牲品。最可笑的是——一些党员自封为马列主义者，所领导的运动成绩总是肯定，他们所主张的都绝对正确；被打击者只能服服贴贴，那些还嘴去解释的人，不都被打得爬不起来了嗎？‘落后分子’，‘立场问题’等大帽子……压在人们头上。至于胡耀邦说的：青年人落后入不了团应由自己负责，青年团不负责任，就更无法理解了。”

“只相信几个‘积极’分子，不相信大家，是党几年来工作的最大缺点。那些‘小报告’们报导片面就不用说了，他们踩着别人的头往上爬，竟报别人的优点轻描淡写，远近有别，说到别人的缺点就语气深长，添花戴叶。这就不能全怪人们和党有距离。‘争鸣’的会上，一些党员还在教条式地发言，有的人不发言，不知他们在玩弄什么圈套。思想改造运动骗过我们一次坦白，忠诚老实运动，组织上宣传相信我们了。但‘肃反’运动又把人们自己坦白的材料老账重查，又骗了我们一次。这次又叫我们‘放’，但愿这次不再受骗。”（“一点感想”编于黑板报）

“我恨一切人，想用刀子戳死人。”（思想改造时说的）

“入了团就跟拴在树上毛驴一样，用鞭子抽，要跑都跑不了。”

“要入团就必须把自己的爸爸和媽媽骂得和王八蛋一样。”

“我学马列主义，目的并不在于建设社会主义，我建设什么社会主义？我是要掌握理论后，好来找寻党中央政策中毛病。”

（二）攻擊肅反運動

“罗隆基成立平反委员会，我认为他是个人物、公正，给一些错斗的人出气。我认为应成立。我看报总是关心是否有成立的动向。”

“法西斯主义我想就是黑暗，大概肃反也就是黑暗。人事工作、保卫工作都算人，这种工作就够”（八月一日交代）

肃反干部“张牙舞爪，和疯狗一样。”

“党所领导的一切，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任何工作都这样说，这就是教条主义，肃反比历次运动都坏，生物系更糟。我原来对系里党员有意见，后来我想这是上级的布置，也不能怪他们。本来我很佩服王金鼎同志，因他讲话逻辑性强，但一想肃反，我就恨他。”

“我认为学校的肃反错误很大，成绩是极小的，原来认为反革命实际一个也不是，肃反是否需用群众斗争的方法进行，我很怀疑。”

“党中央说‘肃反运动是健康的’，这是教条。天津外地各大学肃反方式一律粗暴，是否中央布置的？毛主席提出：‘不能翻案，否则农民要打扁担’，这不正确。难道不考虑我们被肃者的影响”。“上操不正下操歪。我国肃反我认为可能在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思想下进行的。”

“法院根据什么搞反革命，冤枉了好人？宪法是党领导制定的，但肃反运动时党又领导破坏宪法，这不是假民主嗎？资产阶级的民主我不理解，但肃反这样的社会主义民主，我是不愿接受的。”“我要求收回肃反中所写的全部材料，因为是他们给我个公式，被迫写的。履历也要重写，因为只有把自己骂个狗血喷头才算进步。”（与天津市人民代表谈话）

“爱情无阶级性、需要政治基础是教条。我不希望我的爱人斗争我。”

（三）攻擊社會主義制度

“我认为没有一个制度是完全好的。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多少值得怀疑。我只要活着，我终能看到谁是是非。匈牙利事件对我的鼓舞很大，证明我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好。”“我国各运动中斗争对象是匈牙利事件的点火者，三十年后一定会发生匈牙利事件。”（八月一日交代）

（四）反對我國外交政策

“我主张走铁托和印度的中立路线，这样在国际上反更有威望。我认为铁托路线比较好，是一个新的共产主义路线。”（八月一日交代）

經濟系 秦福林

(一) 黨的領導應該削弱

不論就現實情況或歷史發展規律上而論，黨的戰鬥力是減弱，也就是黨的領導力在減弱。但絕大部分人却錯誤的認為黨的戰鬥力不是減弱而應是加強。

一、錯誤的根源：由於斯大林的隨着社會主義發展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的錯誤理論指導下，因而自然的得出下述結論，由於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因而黨的領導隨着鬥爭的尖銳也必然加強，因而在這錯誤的理論指導下引導出來的結論也必然是錯誤的。

二、為什麼黨的領導力在減弱：

黨的領導力減弱也就是體現在黨的戰鬥力減弱上。

① 黨的戰鬥力體現於它的成員，也就是每個黨員。而黨員不外兩部份，老黨員、新黨員及爭取入黨的人。老黨員表現得自高自大脫離群眾，適應不了客觀形勢需要，一方面是由於宗派主義，自以為天下是老子打的，因而造成盲目自大，失去領導能力，另外是由於客觀形勢發展太迅速，自己既不力求進步，而文化水平又極低淺。試問，這樣黨的戰鬥力和黨的領導力怎能不減弱呢？

新黨員及爭取入黨同志，由於宗派主義形成群眾“無用武之地”造成這些人入黨動機不純，入黨後“油条”退化，上述不能說是個別現象。

③ 歷史發展規律：黨最終必然滅亡。如何滅亡呢？就象人由生到死，是由黨的領導力逐漸削弱以至失去存在的必要性而自告滅亡。

三、黨與這一客觀真理背道而馳：

黨為了加強領導力採取“黨天下”的辦法這是完全錯誤的，必須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擴大黨外人士職權，按力做事。對於黨內的某些人有必要“下轎”“下台”。

限於篇幅，不能詳細表達。如某些人認為有必要而且願意的話，我願意在自由論壇上相見。

（原載本校學習簡報第2期題為“黨的領導應該削弱”）

(二) 其他

“要求改選學生會，反對黨團包辦一切”，“學生會應該自由競選”。

“優秀生，留學生不應全是出身好的黨團員，只要他學習好，只要不是反革命，去留學又有什么不好呢？”

“各民主黨派由於黨的重視不足，而在發展上有困難，雖說是互相監督長期共存，但事實上都成了黨的應聲蟲。”

“黨既然能領導自然科學，而向自然作鬥爭是永遠不能消滅的，這樣結論就會說黨也是不會消滅的，這一結論是與毛澤東同志的提法不符的，反之，在向自然作鬥爭時黨的領導就應該削弱。”

經濟系 冷寅勛

(一) 攻擊馬列主義

“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在某些地方不能自圓其說，不能以理服人。如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資產階級需要價值論有什麼區別；無產階級貧困化很難解釋；經濟危機的理論能否成立是個問題。”

“我認為馬爾薩斯人口論有一定的道理，人口增長問題確是個很大的問題。”“馬克思主義的人口論不成體系。而馬爾薩斯人口論則已經成為世界體系。”

“我懷疑共產主義人生觀究竟能把一個人教育到什麼程度。象斯大林這樣偉大的人物，居然都犯了嚴重的錯誤。那末，一般人的共產主義人生觀就更不可靠了。”“我現在雖然學習政治經濟學，但我擔心將來會成為一個唯心主義者。”

“憲法上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修馬列主義課是矛盾的。宗教信徒

都是唯心主义者，如果必修馬列主义課是学不好的，而且也是違反宗教信仰自由的。就是教試打个五分也沒有什么用处。所以，馬列主义課应改为选修課。”

“我認为资产階級有片面性，但无产階級也有片面性。”“一个問題有正面和反面，阴面和阳面；完全站在正面就看不到反面，完全站在反面就看不到正面，为了看到問題的全面，就必须站到側面去看。”

（二）攻擊黨的領導

“党的宣傳工作有很大的片面性，歪曲性，只宣傳好的，不宣傳坏的；只宣傳正面，不宣傳反面。对資本主义国家好的宣傳少，坏的宣傳多，甚至有些不符合事实的真相，失去新聞的真实性。”

“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一样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各民主党派也領導中国人民，党与民主党派是班长与学习干事的关系。”

“共产党、民革、民盟都代表一部分人民，誰也領導不了誰。”“在以后階級消灭了，各民主党派就不一定是代表一个階級了。那时，民主党派就成了各階层的政党，各民主党派的政綱与共产党的政綱日的都沒有本質的區別，而只有方法、政策上的區別。因此，今后竞选、輪流执政是可以的，輪流执政是不会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产党不应该反对竞选，因为共产党得到人民的拥护就不会怕人民不选共产党的。假若怕，那就是說共产党不得人心。”

“开任何会都要党团干部、积极分子参加。这样，落后的方面就不能代表。因此，落后与先进的矛盾就不能解决，因为落后思想得不到反映。”“人民政府是党政不分，学校也是党政不分，应当把外行的人撤下来。班上的工作誰也都可以干，不一定非党团员才行。”

（三）誣蔑社会主义制度

“人类的末日將要到来。其理由有三：①太阳將发生黑子爆炸。②科学的发展將要毁灭人类。③物資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遞增。”“六十年后世界末日就要到了。”

“从私有制轉为公有制初期，有本位主义，所以有官僚主义。”

“向工人宣傳馬列主义，有利于产生官僚主义比私有制的可能性更大。”

“公有制比私有制产生官僚主义的可能性更大，而且严重。其理由是：私有制（指資本主义国家）由于生产資料私有，所以資本家对财产的經營管理都特別关心，不容易产生官僚主义。而公有制（指社会主义国家）則不然，一切都是靠上級指示办事，企业的管理人員很少动脑筋，容易产生官僚主义。”

“地方机关的官僚主义可以通过向上級机关的揭发和控訴而克服，中央机关的官僚主义就必须通过大民主方式去解决。”

（四）誹謗蘇聯

“匈牙利事件，苏联不应当出兵，第一次出兵是錯誤的。第二次出兵不合国际法。”“苏联出兵匈牙利和英法侵略埃及没有什么区别。”

經濟系 鍾世賢

（一）誣蔑肅反運動

“肅反是新旧时代交替不可避免的悲剧，肅反是侵犯人权，違反宪法，私設公堂”。

“毛主席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內說肅反采用群众路綫也会产生缺点，并提出有錯必糾这都說明肅反有严重錯誤”。“我也同意章罗提出的平反委员会”。

“自杀的究竟是怎样呢？是否是反革命呢？往往一个人受冤屈到极点，他宁願自杀而不願活下去这是很自然的”。“要求党向群众公开，向死者家庭道歉，准許同学写慰問信”。

“肅反把反革命分子与政治历史上有問題的混淆起来。因此我为党担心，怕党失掉人心”。“把好人和坏人放在一起，用机关枪扫射，当

然打死了反革命，但也伤了好人，以后再做善后工作就晚了”。

“群众斗争会搞的相互猜疑，弄的几个人都不敢在一起说话，怕受怀疑，人人自危”。

(二) 攻击人事制度，打击、谩骂党员和积极分子：

“档案应该公开，让本人知道，本人还可以写出自己的意见”。“人事档案被一两个人包办了，如果反革命分子加上两条就搞不清了”。

“党员只考虑三件事——离婚、恋爱、升官发财”。“积极分子和国民党特务差不多，积极分子是没有脑筋，是盲从”，“桑健是先进的真正的共产党员，其它共产党员都是落后的，班上的党员应向他学习”。

經濟系 白俊義

(一) 崇拜希特勒。

“希特勒很有骨气，有民族气节，要是我是德国人我就要写一部希特勒民族骨气的诗。”“希特勒这种人很能干，这样大的年纪不结婚，能忠于自己的事业。”

(二) 曲解立场与真理的关系。

“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就能看清问题吗？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不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也可以认识真理。”

經濟系 陸慎成

(一) 对党的人事制度不满

“北大寄来的材料中，对人事制度进行了攻击。这张大字报触动了

我的心。真的！为什么档案材料不让自己看看？档案材料不必要对自己进行保密。自带档案袋时，还要加火漆，我认为这是对人不信任。我想到转业的一份材料自己都不知道，也可能缺少几份。曾要求看，未成。因此一直不满在心。”

(二) 歪曲党的政策、攻击党报

“三反中存在的错误与上级领导有关。那时一层一层的规定百分比。又在方针上要狠！狠！狠！如若三天打不出老虎，领导干部就要停职检查。”党是“逼迫群众向贪污犯进行斗争。”“三反、肃反应用的方式是不聪明的，用这种方式是否能把反革命分子吓出来呢？不可能的！自己经历过几个运动，但就三反运动说，是不满意的。觉得这没有人道主义，反贪污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样经过司法机关是不好的。这种方式确是侵犯人权，不能起积极作用，而起的副作用更大。”

“我想不通：在党初期提出百家争鸣时，说毒草也可以放，而我们今天的态度是毒草要铲除。所以，我很怀疑是方针政策的变化。我们今天为什么提出批评呢？这就是不讓社会主义的毒草放！”

“我完全同意储安平的办报观点，是事实就登。”“我们的新闻报导，是报喜不报忧。如农业合作化偏差报导少。各大政治运动中党领导的严重错误报导少。”“我们国家的报纸是清一色的，都是看着人民日报的眼色行事。”

(三) 攻击党组织、挑拨党群关系

“党工作的成绩，大家有目共睹。再说一套有什么用呢？目前三害严重，我认为官僚主义比帝国主义还利害。大家要雷厉风行地把三害打下去。”“党的整风”是诱敌深入，一棍子打死的策略。”

“对有些维护党的利益的人，我思想上很反感。我的思想和有些人有抵触时，就听不进去正面的话。”

“现在是刮十二级台风的时候了，一些人都在见风转舵。”“我一向是后进者，我不会世故，如果我世故的话，我也会照抄人民日报。”

“看人不能从印象来看，当然改变印象较难，有些人敢于发表自己意见，敢于独立思考，这是否就是落后呢？”

“党团教育工作做的不好，团委对团总支，团总支对分支，分支对每个团员都不了解。”

（四）攻擊蘇聯共產黨

“斯大林錯誤在晚年已經知道，为什么在廿大才提出！而廿大也沒有提出？”“赫魯曉夫又說在斯大林生前提出是不可能的：可能被称为是破坏党的团结，这是不能自圆其說的。”

“我認為在反对个人崇拜时是應該把斯大林的錯誤重点的談出来，因为一般人看法是強調于一方面的，所以強調斯大林缺点的方的，是正确的，是必要的。”

（五）拒絕改造

“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打击別人，抬高自己。因为在每个运动中都有一些人爬上去，和一些人被赶下来。”“我是独立思考，你們不應該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言。当沒有了解別人意图时，就不要乱加批判。”

“大家都要問我几句，这样就显得进步。”“我不同意班上对我一个人开火。昨天是希望大家提批評，但不是把人置于死地。”“我对这种會議表示抗議！再这样下去，我就要向組織請假，不參加會議！昨天晚上上的會議，（註：經濟系和中文系工农学生的反右大会。）我沒參加，隨便你們怎么处理。就是开除我的国籍、学籍，我也不檢查！回家去也行。”

經濟系 陸訓壽

（一）否定教學改革成績妄想資產階級經濟學復辟。

他公开主張取消全国各課統一教學大綱，他說：“我們学习中，一

方面感到課程內容重重重复，另一方面許多應該学的沒有学到，……如我們学經濟的資本主义生活中許多問題我們一点也不懂……連現代的資產階級一些術語也搞不懂……。学了国家与法权，連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会組織都不知道……。我真不理解为什么一些众所周知的常識要一直講到学生发膩呢？为什么另外一些應該知道的东西却一次也不講呢？难道講了以后学生的思想就会資本主义化嗎？当然，要怪罪我們的老师們是不对的，因为老师講課必須按照教學計劃教學大綱还要根据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黃皮書啊！”“資本主义經濟学課開得太少，應該多開。不然的話，二十年后，資本主义經濟学就要絕跡了。”

（二）攻擊黨的人事制度。

他反对毕业生統一分配。他說：“談到分配工作我是有意見的。55年毕业生有許多教地理、历史、美术，甚至有几位教体育，这件事談起来也許令人吃惊吧，难道在学校中鍛煉就是为了毕业后教体育嗎？这么些年來据我所知道沒有一个經濟系毕业生被分配到科学院和經濟研究機構中去的。这么多年来科学院一个大学毕业的学生也未添嗎？未必吧！是南开經濟系毕业的学生个个都不如人嗎？我想老师們也不同意我这个結論吧，原因在那里呢？这就要搞人事工作的同志来回答了。是不是否定了南大經濟系的老师也把南大經濟系的学生否定了呢？”

他攻击选拔留学生的办法。“在选派留学生問題上，……不僅要党团员，而且还要家庭出身好的。試問这不是唯成份論嗎？而且这一笔冤債叫出身不好的人到何处去申訴呢？他們不能自由选择娘胎呀！我要求此后选派也好，投考也好，在政治条件上，是否看本人的历史和政治品質，而不看家庭出身。”

（三）煽動共青团員脫離黨的領導。

他反对党提出的，党要求共青团做什么，团员就應該回答“是”这一口号，說什么这是把青年人培养成机器人“这样作就是培养盲从。”而且会給官僚主义者鑽空子。

(四) 誣蔑肅反運動。

認為右派大字報寫肅反等於零，這是受過怨屈的人寫的。他說：“斗的多，真正的反革命少”。他主張肅反採取一種新形式“根據再多一些，方式改一下才好”。這樣“可以少殺一些人。”

物理系 張數玄

(一) 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看法

“我認為在整個共產主義運動中分為兩派，一派是斯大林派代表老路綫，一派是鐵托派，代表新路綫，我認為斯大林的錯誤，不僅是個人的錯誤，而是表示領導共產主義運動一條路綫的錯誤。我當時認為斯大林在世時，鐵托是叛徒，而斯大林逝世後，鐵托成為了同志，並且赫魯曉夫作為領導者了，這表示老路綫在蘇聯的失敗，而如鐵托所說的，‘從南斯拉夫開始得勝的路綫，在蘇聯開始取得了成功’。”

“蘇聯的新老派已交鋒三次，第一次是貝利亞事件，第二次莫洛托夫，馬林科夫辭職，第三次是莫洛托夫，馬林科夫的反黨集團，蘇聯現已有很大改革。”

“我認為波、匈事件起因都是由於新、舊路綫的鬥爭，在波蘭、鬥爭展開的比較好，新路綫勝利了，而在匈牙利，則在鬥爭中被反革命份子投了機，以致造成了匈牙利的暴亂，所以我認為內因與外因是并重的。至於其他國家，我認為由於吸取了匈牙利的教訓，新舊路綫不再鬥爭了，而採取協調的方式，如蘇、南、阿、保等國領導人的同志式會見，我認為這就是協調的具體表現。”

“蘇聯撤回在中國駐軍，這是因為過去斯大林犯了錯誤而侵犯了中國主權。莫洛托夫是斯大林派，赫魯曉夫是改革派，鐵托所指的東方斯大林派大概是指中國。中國一定會有大變革。”

(二) 關於國內形勢

“斯大林既然犯了錯誤，毛主席也可能犯錯誤。中央80%反對毛主席，黨的地方組織腐化相當嚴重，有些黨員是無頭腦的人，三害份子很普遍。匈牙利事件後，證明這個看法是正確的，整個黨都可能犯錯誤，因此中國也必然有一個大變革時期，而大鳴大放正是這個大變革的開始。”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提出來，黨又發出了整風的號召，當時我的看法是認為黨中央和毛主席認識了目前的形勢，因而中國的大改變將要開始了。也就是說新路綫在中國將要開始勝利，由於中國情況，我的新路綫的內容有這樣一些：

① 對百家爭鳴，贊成完全自由發表意見，不要一切標準，鮮花毒草有同樣權利放出，而在爭鳴中馬克思主義只能作為一家，不應作為主導思想。

② 對民主，反對選舉的單一名單制，而贊成自由競爭。

③ 認為自由，人權是天賦的，是絕對的，反對‘侵犯人權’。”